

【编者的话】

日前，广州多处天桥和高架桥桥底的水泥锥引发了人们的关注。网友猜测：这些水泥锥可能是为了驱赶流浪汉而建。面对公众的质疑，广州建委承认，水泥锥已经修建十年，最初的目的是防止流浪汉在桥下休息。

小小水泥锥再次暴露了城市规划中的大问题：城市对弱势群体缺乏人道关怀，对外来群体多有歧视，离真正的开放、包容还远得很。



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到今天，辉煌的钢筋混凝土丛林之下，城市底层人们的生存状态却依然堪忧。牵涉其中的人们至少包括：进城打工远离家人而饱受歧视的农民工，和父母一道来到城市却因户籍问题没有书念的孩子们，子女不在身边的空巢老人，宥于城市规划不得不离开故土的拆迁户，受到驱赶的流浪汉、乞丐、性工作者。对于他们而言，城市并不一定意味着现代、文明、激动人心的机会，而更有可能是孤独、不被接受、令人绝望。本期 1510 周刊，关注城市弱势群体的权利，讨论城市里的人们应该如何共同生活在一起。

世界级盛会似乎总让弱势群体感到尴尬。2011 年大运会前夕，深圳警方在 100 天内将将近 8 万余“潜在治安高危人群”赶出深圳。媒体人汤嘉琛认为，在正常城市生态下，不同的社会群体原本是可以和谐共处的，管理者要正确认识这些社会风险，对弱势群体的基本权利比如居住权亦要有尊重。闾丘露薇则提到，为城市发展添砖加瓦的农民工的生活条件相当恶劣，城市生活中，也总是被忽略的那一群。当举国之力筹办世博会，奥运会时，真的是不是应该想想，如果这一个个的农民工，他们的生活也能够匹配上这样的场面，那会是多么美好的事情。

城市化所产生的问题在全球都是相似的，而各国的解决方案又是如何呢？在《落脚城市》作者桑德斯和学者秦晖的对谈中，聊到各国贫民窟的情况，他们认为城市应该对贫困人群有更多的宽容，如果不能给他们提供更好的住所，就不要把他们很差的住所摧毁了。不能既没有福利又没有自由。片桐惠子教授介绍了日本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社区经验，在城市化带来的社交网络弱化不可避免的大环境下，采取发展社区内网络的手段，研究老年人的思维方式，发明符合老年人需求和口味的活动方案。卞中佩和陈慧敏的《台北城市化与拆迁》关注台北士林区的钉子户，永康小区的居民，乐生疗养院的院民。叙写了在外部快速更新的压力和内部尊重弱势、尊重民主程序的呼声夹缝中的台北市。城市的发展步伐快慢不仅仅只是政府主导的事情，市民也应该有发言权。

学者徐贲的《没有“市民权利”就没有城市》一文借由美国城市的公共生活，论述了我国的“非自然”城市化对公民权利的两重侵犯，第一重发生在在强行征地和拆迁的过程中。第二重发生在难以成为真正市民的生活状态之中。他认为，都市化使人口和资源向大城市过度集中，但是，这些资源却没有能够由在城市中的所有人口共同分享，这是不符合社会正义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作者雅各布斯在《地区管理和规划》中详细描写了美国大城市的公开听证会制度，以及市政规划中的管理方式。公开听证会虽然有其局限性，但这个过程也有让人振奋的地方。如此众多的市民表示出的诚意，以及这种强烈的诚意带来的鲜活的生命力，都是让人振奋的理由。“一些非常普通的人，包括穷人、受歧视者和未受教育者等，会抓住这个机会表现他们

自己，就像是一些有名望、有思想的人在表现他们自己一样。”没有公正平等的市民权利，就没有一个好的城市。

最后，一个包容开放、尊重弱势群体、多元人群共生共存的城市到底应该是怎么样的呢？相信 E.B.怀特的《这就是纽约》一文能给出一个漂亮的答案。他写下了心底的纽约：“纽约就像一首诗：它将所有生活、所有民族和种族都压缩在一个小岛上。纽约因他们之间的碰撞与融和，成为世界大同的常年展台。纽约公民的宽容，不仅是天性，而且是必须。这座城市必须保持宽容，否则就会在仇恨、怨愤和偏执的辐射云中爆炸。”

这或许就是城市的魅力。

1510 周刊由志愿者团队制作，每周出版一期，通过网络发布，所有非一五一十部落的文章均经过作者或首发媒体的授权，期待大家的关注和建议。

目录



在 Facebook 分享本期周刊

在腾讯微博分享本期周刊

在 Twitter 分享本期周刊

在搜狐微博分享本期周刊

在饭否分享本期周刊

在人人网分享本期周刊

在新浪微博分享本期周刊

在豆瓣分享本期周刊

在网易微博分享本期周刊

【议】

8-1 汤嘉琛：弱势群体不是影响城市稳定的假想敌



“城市因人而生动。正是有了操持不同工种的劳动者，有了各种层次的老百姓，一座城市才会具有迷人的生活气息，而不至于沦为钢筋水泥的丛林。纵是确有极少数人不能在这个城市有尊严地生存，去留与否也应是个人自由选择。”

一场即将到来的盛会让深圳如临大敌，草木皆兵。在过去 100 天的时间里，深圳警方已陆续将 8 万余人赶出这座城市。他们或是涉嫌卖淫的“失足妇女”，或是身患精神疾病的患者，或是昼伏夜出的无业人士，或是扬言报复社会意者，但他们身上都被贴了同一个标签：潜在治安高危人群。

作为一个走在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城市，深圳粗暴地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划分成三六九等，已经明显有违现代社会公平正义的理念；动用行政力量，将那些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强行排挤出去，更是对公民居住权和自由迁徙权赤裸裸的践踏。遗憾的是，如此于情于理于法都有失偏颇的做法，竟被有关部门当作一项“战果”来宣示。

当然，只要遇到盛大活动就“犯病”，深圳并不是第一个患者，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患者。照理说，随着中国日渐强大，越来越多的世界级盛会都更加青睐我们，有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丰硕成就撑腰，前进中的中国理应更加从容和自信。但是，当全世界的目光聚焦过来，那些被选中的城市却总是突然像个要面见贵宾的小媳妇儿，开始担心自己的衣衫不够整洁，担心自己的妆容不够精致，担心自己所用的香水不够高雅，于是在闺房里如坐针毡，自己吓唬自己。

城市因人而生动。正是有了操持不同工种的劳动者，有了各种层次的老百姓，一座城市才会具有迷人的生活气息，而不至于沦为钢筋水泥的丛林。纵是确有极少数人不能在这个城市有尊严地生存，去留与否也应是个人自由选择。在正常的城市生态中，不同的社会群体原本是可



以和谐共处的，但有些城市的管理者却容易形成一个坏习惯，他们总是惯于想象出很多的假想敌。路边的小摊小贩是潜在的敌人，小区维权的居民是潜在的敌人，向包工头讨薪的农民工是潜在的敌人，房屋遭强拆的业主是潜在的敌人，失业青年是潜在的敌人，精神病人是潜在的敌人，谁要影响哪怕有可能影响到稳定，谁就是敌人。

正是这种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定势，让城市主政者将社会风险估计得过于严重，以至他们总是要求自己的下属将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久而久之，这种“自己吓自己”成了一种僵硬的处理人们内部矛盾、处置日常事务的方式。几年前，有一个帖子备受网友追捧，其标题《稳定什么也没有压倒，只压倒了我们》，虽然有些惊悚，但也有几分道理，值得我们反思。

我们应该如何应对社会矛盾？视而不见当然是不负责任的表现，但谨小慎微以致畏首畏尾也十分不可取。毕竟，很多被视为威胁的社会矛盾，其实只是正常的利益博弈，远不至于将社会拖入动荡的泥淖。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一个基本的共识是，当前中国的社会结构仍具备相当的弹性，正是这种弹性让我们能够在应对各种挑战时化险为夷，平稳度过危机。如果不能对这一点有清醒的认识，总是在试图消除冲突的时候又制造新的社会冲突，这样的社会必然缺少美国社会学家科塞所说的“安全阀”。

可以说，只有那些对自身容纳冲突能力极其自卑的城市，才会在盛大活动面前方寸大乱，胡乱地向辖内的民众展示肌肉，让老百姓口中有怨言胸中有怨气。而一个真正值得人尊敬的城市，并非是没有社会矛盾的乌托邦，而是能够容纳冲突和用制度化的方式解决冲突的生活空间，它没有敌人。

（汤嘉琛，媒体人，专栏作者。原文链接：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56621）

【返回目录】

8-2 闾丘露薇：不应该被遗忘的那些人

“如果不是为了生活，谁也不会背井离乡，谁也不想过这样的生活。而所有的这些，都是希望未来，能够变得好一些.当我们举国之力办世博会的时候，我想，我们真的是不是应该想想，如果这一个个的农民工，他们的生活也能够匹配上这样的场面，那会是多么美好的事情。”



遇到一个一开口就说不停的上海出租车司机，在为自己的城市骄傲了一把之后，话题忽然转到了农民身上。他说，现在上海的服务行业都不是上海人了，因为上海人太懒惰，宁愿拿低保，也不愿意辛苦工作。问题是，这些外地来的农民工等他们年纪大了，他们怎么办呢？

我问他，如果让这些人留在城市，分享上海人的所有福利，你愿意吗？他毫不犹豫的回答，这当然是政府的责任，总不能够把他们扔回老家？他开始不停的给我分析，为何政府对农民还不够好，比如报销医疗费，城市人自己承担小部份，而农民则要负担大部份，城市人可以不工作也有钱拿，农民却是手停口停。

在世博园区里面，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那些农民工。坐世博地铁专线，几个拿着大大小小工具的农民工被拦在了安检口外面，因为他们的证件不齐全。看着他们不知所措的样子，我想他们最担心的，是如果不能够开工的话，一天的收入就没有了。

对于这些农民工来说，虽然这个历来规模最大的世博会让人惊叹不已，但是对于他们来说，这些和他们没有关系，和他们有关的，是每天能不能够准时开工，而在工程完成之后，他们能不能够准时拿到自己的工资。

这让我想到那位曾经参与了鸟巢建设的农民工，这位来自河南的农民工已经变成了一个讨薪明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运气的问题，从奥运工程开始，欠薪的经历，一次接着一次。到现在我还记得为了接受我们的采访，他穿上整齐的衣服，但是他住的那个小小的房间，没有窗户，没有卫生设备，虽然已经整理过了，但是当我把自己的包放在他的床上的时候，还是犹豫了一下。

如果不是为了生活，谁也不会背井离乡，谁也不想过这样的生活。而所有的这些，都是希望未来，能够变得好一些。当我们举国之力办世博会的时候，我想，我们真的是不是应该想想，如果这一个个的农民工，他们的生活也能够匹配上这样的场面，那会是多么美好的事情。

“农民，让城市更美好”，这是蔡国强在世博期间举办的一个展览的主题。他说，在世博会上，应该有农民的一席地位，而这些农民，不是一个群体，而应该是一个个鲜活的个体。也因为这样，他没有把目光放在我们固有的对于农民的那种印象上面，他选择六十个农民发明家。

看者这些农民们发明的飞机，航空母舰，惊讶之余，会反问自己：其实自己对于中国的农民到底有多少的了解？在我的固有印象当中，农民们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但是我是不是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农民也是一个个鲜活的个体，他们有自己的故事，他们不是一个整体概念。

之所以有这样的印象，我想是因为从小我们所接受的教育，还有这个社会，一直重视的是一个整体的形象，而不是个体的表现。也因为这样，这种审美以及价值标准，反映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国家荣誉感，到社会地位的认同，忽略了个体的创造能力。

蔡国强说，他选择这样的口号，就是为了和世博的主题进行呼应，让城市人进行思考。在他眼中，农民的组成是一个个鲜活的个体，他们有自己的梦想，尽管一些梦想没有实现的可能。但是他们敢于想象，即便是在一个资讯封闭的环境里面，他们的想象力从来没有间断过，反而是城市，让人开始变得千篇一律，而这种千篇一律，最终会产生一种不安。

不管是那位出租车司机，还是蔡国强，他们用各自的角度去看农民。这是一件好事情，因为这说明，这个社会，越来越多人真的开始思考，如果没有了农民，城市会怎样？生活会怎样？

（闾丘露薇，媒体人。原文链接：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37191）

【返回目录】

【鉴】

8-3 道格·桑德斯、秦晖：城市化会带来什么？

“世界上的穷人住宅区各种各样的。所有这些地方我都问过，假如你们不是全家住在这个地方，你们只是进城打工，把家留在乡下，每年见十几天，好不好呢？所有人都认为他们不能忍受这种状态，他们愿意全家住在一起。我们国家实际上是以三亿人口的家庭离散作为代价换得了城市的光鲜，我认为这是非常不好的信息。”





（编者按：此文为《落脚城市》读者见面会的速记稿）

主持人：各位读者朋友晚上好，读者见面会先进行第一个环节，有请这本书出版方负责人王启宪先生说两句开场白。

王启宪：非常感谢这么多人来参加《落脚城市》的对谈。我是杭州母语文化负责人，我们是一家新的出版公司，希望大家能够多买书，买好书。这本书是我们公司推出的第一本书，是关于城市化的书。前面的环节当中我们提到过，这是一本什么书、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本书，我简单的开场，今天我们主要的环节，我们也非常荣幸请到桑德斯本人先生，以及清华大学的秦晖老师，也非常感谢秦老师参加今天的座谈。

《落脚城市》这本书是一本关于城市化的书，城市化是我们每个人，不管在在中国还是在世界的哪个地方，都在面临一个事情，我们为什么出这本书，第一个原因从情感上来讲，我相信今天来的读者当中，大多数人可能都经历着从你们的故乡、你们的家乡来到城市，或者说你们的父辈，你们身边的朋友，都有类似这样的经历，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自己得到了什么，你

们自己最大的感触是什么，我相信很多人能从这本书里的一些人物故事找到你们的共鸣点。第二，这是一本非常宏观的书，也非常微观的书，在前不久上海举办的中国城镇化高层国际论坛上，正式提到一个数据，这个数据是中国几千年以来第一次城市人口的比率大于农村人口，第一次城市人口比率达到 51.27%，所有人都处在历史的节点当中，也许从今年开始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历史会发生一点点的转变，这个转变的起源就是从我们的人民，从迁徙的过程当中，由城市人口大于乡村人口之后所带来的在经济上、文化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本身所存在的城市当中的很多改变，城市是我们进入这个世界的一个入口，城市发生了改变，我们自己的生活发生了改变，会带来些什么、会改变些什么。我借用在当时高层会议当中一个荷兰干事长提过的一句话，城市不仅仅是砖头或者是沙粒或者是建筑，它更多的包含我们的未来，我们的理想，我们的方向。更多的话题交给作者本人桑德斯先生来介绍。

道格·桑德斯：大家来到这里我感到非常受宠若惊，大家会对这个话题有兴趣，我也非常的欣慰。如果这本书有一个核心问题的话，那就是人们怎么样从泥地的小屋进行迁徙变成中产阶级。有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每个人还住在那种泥地小屋的时候是多久以前的事情？对于我来说大概两百多年以前在欧洲。但是对世界上大部分人来说还是非常新近的一件事。我们快速的展示一下《落脚城市》这本书里面的图片。

（照片）这是印度中部一个村庄。这是那个村庄之前的住民，后来在孟买买到了他们的第一座寓所。刚才那张像素很差的照片是巴西东北部的一个村庄，那个村庄里的一户人家通过 IT 技术发展成现在非常富足的家庭。（照片）这是四川一个贫困的家庭，他们家庭日收入不足一美元。这是刚才那个村庄附近的一户人家，他们 15 年前的状况大概和之前的照片类似，但是现在他们在重庆拥有这么一个寓所，现在年收入已经达到 15000 美元。这并不是一个谜一样的迁徙过程，你很难找到在一代之内完成这样一个转变的例子。他们必须经历过渡性的城市社区状态，我将来称之为落脚城市。（照片）这是印度第一代家庭所经历过的生活状态。这是第二代的家庭，是巴西叫法维拉的聚落，经由政府的援助变成现在这样一个状况。

（照片）四川的家庭，有 12 万人从四川的村庄迁移到重庆附近叫六公里的地方。这个村子在官方记录上是不存在的，如果你去问重庆政府的官方人士，他们会说是的，我们的城市化发展非常快，都是非常规整的公寓大楼。实际上大部分的城市化都是由这样的建筑组成的，他们由乡村移民自己建起来的，他们要么是别无选择，要么是主动的选择这样一种形式。这个地方在 15 年前只是拥有 70 个人口的农村。很快人们就搬进来了，现在已经有 12 万人口居住在非法存在的城中村里面。他们吃住在这样一些街道上，这里进行非常多的生产活动，他们大部

分会在机械工厂。大部分家庭会用这样的收入开始发展他们的小生意，制造重庆非常著名的火锅。他们最终会变成这个社区中规模更大的经济体。对这样一个社区的官方形象就是非常的不卫生，到处都是垃圾，有不少人住在垃圾堆上，下水道也非常的脏。不可否认的是这是一个非常不卫生危险的地方，因为政府并没有对此作出任何措施。其实这样的地方发生着相当可观的经济活动，如果你从主街道走下来进入小巷，就会发现很多正在进行的工厂运作。你会发现非法营业的纺织厂，他们可能会从自己的邻居手里借来一笔钱组建起自己的工厂，塑料制造工厂，木工厂，金属工厂以及各种各样的摩托车。

（照片）有很多像这样的家庭，他们三四年前搬到这里，建起这样一个家庭工厂，做着木制的浴桶。他们会把自己一大半的收入都寄回到农村家里，这一笔收入成为当今农村的主要收入来源。因为有户口政策，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在这里让自己的孩子上学受教育，他们不得不和自己的家庭分离，这 12 万人口过着与家人分离的生活。这是一个比较罕见的例子，这家人把自己的孩子全都带到这个城中村里面来，孩子不得不住在工厂厂房里面跟他们一起受苦，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大的冒险。这就是目前的一种社会流动现象，他们做着非常精心的计划，想从农村发展。不幸的是照片中展示的这些社区目前都已经被推土机铲平，不知道这其中人的命运怎样，他们是否住进更好的公寓楼。

谢谢，我们现在开始讨论。

主持人：感谢本书作者道格·桑德斯分享这个话题。下一个环节我们请秦晖老师与读者朋友们一起分享他所做的领域的一些研究和观点。

秦晖：我跟桑德斯先生也是刚刚见面，他这个书提到了在前几年曾经引起不少轰动的观点，那次我在深圳做了演讲，当时深圳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驱逐外来人口，扫荡棚户区的一场运动。有人在演讲后提问的时候提到这个问题，我当时就说深圳应该对这些人有更多的宽容，如果你不能给他们更好的住所，你就不要把他们很差的住所给摧毁了。后来被媒体报道的时候被报道成我建议深圳发展贫民窟，于是又引起很大的争论。其实老实说，世界上没有人会说贫民窟是个好东西。但是比贫民窟更不好的是什么呢？我觉得是家庭离散。我在印度最糟糕的贫民窟问过，我说你们为什么要全家跑到城里住到这个地方，你们能不能只是一个人过来，把家里留在乡下，这样过下来好还是你们现在这种状态好。我觉得世界上的穷人住宅区各种各样的，有很差的，像印度那样的。也有不怎么差，像拉美有些地方。乃至更光鲜的发达国家的一些所谓的 slum，发达国家的 slum 都是由公屋组成，但是人文环境很糟糕。所有这些地方我都问过，假如你们不是全家住在这个地方，你们只是进城打工，把家留在乡下，每年见十几天，

好不好呢？所有人都认为他们不能忍受这种状态，他们愿意全家住在一起。我们国家实际上是以三亿人口的家庭离散作为代价换得了城市的光鲜，我认为这是非常不好的信息。

我们现在看到的城市化过程各种各样的，最美好的城市化过程究竟是什么样的我们还不知道，是不是有一种城市化是完美无缺的也有待探索。但是我能够回答的是，什么是最糟的城市化。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城市新移民，一般来讲无非就是两个出路，一个是如果这个国家实行所谓的自由放任的政策，允许这些穷人自己盖一些很简陋的房子，形成所谓的贫民窟。另外一个状况，如果政府很左，实行所谓的福利国家政策，他们就会给穷人盖那些比较好的廉租房，改善他们的居住环境。更理想的是，这两种条件兼而有之，他们可以自由的进来，进来以后国家会给他们提供更好的条件，既有自由，又有福利。但是我觉得最不好的就是既没有自由又没有福利，这种状况在城市化过程中一定要尽快避免的。

主持人：非常感谢秦晖老师。下面桑德斯先生会跟秦晖老师一起做一个互动的环节，这个环节之后两位会跟读者朋友进行互动提问。

道格·桑德斯：非常高兴这次谈话能够进行，秦教授关于中国发展的观点有很大价值，尤其是在城市和乡村变化的过程。就您刚才提出的对于人们既没有自由也没有福利的忧虑，我们应该怎么样跨越住房危机去解决它，尤其是为非常贫困的乡村移民所建造的房子，是否我们只能选择住在条件很差的环境里面没有教育，没有福利，同时政府只有非常雄心勃勃的改造城市的计划。除了制定政策的人之外，我们还能做些什么，由底层向上的活动？

秦晖：当然我们要承认我们的特殊国情，我们的政府特别爱面子，它是不可能允许城市里面这些进城农民自己盖一些简陋的房子。我们的国家不是没有很简陋的房子，但是这些房子我们不把它叫做贫民窟，如果是乡下人盖的，我们把它叫做违章建筑，如果是城市户口的叫做棚户区。其实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城市人口，尤其是在改革前有很多人住在棚户区。但是大家也可能知道，那个时代有权力居住在棚户区而不被去驱赶是一项重要的特权。如果你住在棚户区，别人又不能赶走你，说明你在中国是所谓的城市人口，是有特权的。我们上山下乡的时候很多棚户区的子女给赶到乡下去，他们子女被赶走以后他们的居住面积有了改善，人均居住面积扩大了。但是没有人会把这个作为一个幸运的，相反大家都羡慕那些子女能够不上山下乡，全家挤在棚户里。因此我觉得我们中国现在强调居住权还是很必要的。去年我们在深圳和三亚这些地方都看到政府驱逐进城农民，而且提出不补偿、不安置，否则后患无穷。我把你驱逐就是白驱逐，一分钱不给，而且不提出安置。我觉得这种现象要改变。但是大规模改变，当然也很困难。今天我们的进城农民，大部分不是居住在他们自己盖的简陋住房里，而是租住城市居

民盖的棚户区或者城中村。在这种情况下现在我们可以提出的一个诉求就是，假如城市要对这一类的居住区进行改建，对城中村的房主进行补偿，这当然是必要的，而且我们这些年来在这一点上已经有了不小的进步。可是更重要的，还要对城中村的主要居民，也就是外来的租户给予一个交待，不能对他们实行无条件驱逐政策。因为我们现在对城中村的改造即使再进步也只不过是对房主的补偿增加了，对租户还是无条件驱逐的，我觉得这种现象不能持续下去。所以我提出城中村外来人员租户权问题是我们需要解决的。不能说要把他们赶走就赶走。

道格·桑德斯：我想谈一下另一方面，也就是农村的出境，您本人经历过整个历史，当然并不是您自己的选择，而是生活背景导致您不得不去经历。现在的状况是否仍然是贫困的农民依靠迁移人口寄回去的收入来生存？还是已经有了相应的改善？

秦晖：我觉得应该相信农民是理性的，假如一个村子普遍存在家庭离散现象，肯定是因为，第一，没有人外出打工他们就过不下去。第二，全家进城，我们现在的政策又不允许。所以才会造成这样的现象。我觉得这是几乎用不着探究的。假如他们可以全家进城他们就全家进城了。世界上城市化过程中出现这么大规模的离散人口，在我看到的个案中，除了中国以外就是南非在种族隔离时期有这样的现象。其他国家都没有的。它可以有大量的贫民窟，但是不会有大量的离散人口。

道格·桑德斯：南非的现状跟中国相比是怎样的？

秦晖：当年种族隔离，白人政府经常把美国作为他们的反面教材，他们说你看美国允许黑人进城，所以在城市出现了大量的贫民窟，芝加哥、底特律这些城市问题也很大。他们说我们是只许黑人进来打工，不许他们安家的，就是实行所谓的宿舍劳工和黑人家园制度。他说你看我们的城市很漂亮。的确在种族隔离时期，南非城市很像北京，非常漂亮，农民工都住在工棚里，绝不会有破破烂烂的房子。每到圣诞节前后出现民工潮，这些人都回家过年。这种现象到种族隔离制度废除以后就结束了，黑人可以理直气壮进入城市，而且可以在城市里面各显神通，的确给新南非造成很大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南非的一些种族隔离理论家没有说错，废除种族隔离以后，南非的城市就变得不那么干净了，治安也变坏了。南非的城市的变得有点像芝加哥或者底特律。甚至有人说变的有点像马尼拉。但是如果你问南非人，尤其是问南非的黑人，当然这种状况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但是这种状况相对而言更可取还是种族隔离时期那种漂亮的城市但是只是白人的城市更可取呢？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宁可现在这种状况，他们也不能回到过去那种状态。现在南非城市比中国的城市要糟糕，但是在种族隔离时期跟中国的城市差不多的。

道格·桑德斯：就像书的一开始提到的由泥地小屋居民迁移成为中产阶级的状况，是否已经在中国更多的发生了？不是用一代而是两代、三代，甚至更多来完成的美国梦，是否现在有一个相应的中国梦？社会之中是否还有这样壁垒分明的隔阂呢？

秦晖：我觉得三十年来当然中国的变化是挺大的，进步也是不小的，但是离一种正常的城市化过程可能还有相当的距离，这就是中国现在有三亿的家庭离散人口，这是非常不正常的现象。包括我们现在讲的城市化率有多高，实际上包含很多单身打工进城的人在内。这些人能不能叫做城市化人口，我也表示很怀疑。但是实事求是的讲，我们今天的政策已经比过去宽松，而且这个宽松的路径和很多国家走过的路也一样的，比如说南非，原来根本不允许黑人进城，那个时候只有白人把黑人抓进城去干活，没有黑人自己跑到城里来的。然后开始有黑人自己进城打工，于是南非给他们发那些证件，就像暂住证一样的东西。警察到处在街上，一见到黑人就查证件，没有证件的就抓起来，像孙志刚那样，送去昌平筛沙子，有时候还暴打他们一顿。种族隔离时期末期南非不敢轻易的抓人，改成罚款。其实我们中国现在就处在这种现象，在孙志刚事件以前可以对农民工见到就查证件，没有证件就抓起来，现在这种现象已经逐渐减少，还是有查证件的，如果没有，一般来讲也不抓，都是以罚款代替。这种状态大致就相当于南非在种族隔离制度废除前五到七年的状况。当然种族隔离制度被废除以后，再也没有人查暂住证，也没有这个东西了，当然就进入后一个阶段。我觉得这个阶段对于中国来讲也是迟早不可避免的。

这里我想请教一下桑德斯先生，我对中国应该怎么样还是有些想法的，但是发达国家面临的城市化弊病到底应该怎么解决，我想不出所以然来。就像我刚才讲的，怎么避免最坏的可能我们知道，但是怎么创造最好的我们还是不知道。像美国的很多城市，底特律等等，这也是当年南非白人政府讥笑的，让黑人进城，导致多么严重的结果。这个问题在美国这样的国家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当然相对而言欧洲好一些，因为欧洲黑人问题没有那么严重，但是美国这个问题的确相当严重的。

道格·桑德斯：城市化发展非常糟糕的例子在东方西方都有，尤其是欧美城市的城市化人口迁移的历史中我们可以学习到经验。有一些状况我们可以避免，其中一个是是否阻止农业人口迁移进入城市，特别是城市化之后使农业人口不得不往城市迁移。第二是已经迁移落脚到城市的居民，不给他们正式的存在身份。最大的例子是发生在 1789 年的法国大革命，当时在巴黎墙内居住的人民非常富裕，生活很好，当时有统治政府给予他们的正式身份。但是墙外有一些法国人，类似于城中村之类的城市形式，有很多各地农村居民下仆在那里聚集，他们的各种

合法权益进行限制，他们不能合法的应聘工作，甚至连面包有时候都领不到。这样一股愤怒的情绪最后导致他们对巴士底狱的一场攻击，就像当时在大部分欧洲大地上发生的一些革命，都是由一些农村户口的人民为主体，都是由这样的部落愤怒而产生的。我们更多的是谈到农村这样一个现象的经济层面上的影响，我想知道这样一个城市迁徙对于我们这代人的心理影响是怎么样的，因为在城市迁徙过程中出现大量的家庭离散以及农村的空巢现象，只有祖父母居住在农村，带着他们的孙子孙女，父母往往在一些大城市里打工，把大部分的收入寄回家里，只有在每年春运的时候回家见一下家人。这种情况的大量发生，可以说是一个自然现象，城市化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但是这对我们这一代的儿童人口造成什么样的心理影响？大概有上亿这样的儿童，他们的身体状况也许比以前有所提高，健康方面都有改善，但是心理方面是怎样的呢？

秦晖：这个问题的确非常严峻，对于未来的中国会有很大的影响。今天在农村有很多孩子，从一出生开始就过着类似于孤儿的生活，但是他们肯定是有完整的家庭。这不但有农民工的因素，还有目前由于乡村衰落，政府的服务也开始退缩。大家可能都知道，很多地方原来的农村中小学都合并上收，比如说小学上收到乡镇一级，中学上收到县城，因此这些孩子进小学就得住校。当然我们国家现在对住校也有一些帮助，这些小孩从一进小学就开始离开家庭住校，且不说他们是独生子女，他们从小学时代就离开家庭，中学也是住校，都是在远离家庭的地方，从中学毕业要么就在家里留守，要么就进城里，也是单身打工。像这样的一代孩子，他是完全没有对亲情的体验，这些人的心理会有严重的问题，将来在中国，不说别的社会问题，就说社会的伦理基础，我觉得都会产生一些问题。这个现象导致很怪诞的现象，这十多年来，本来在很多地方都被认为是城市里比较严重的现象，在中国往往是农村比较严重。比如说自杀率，比如说家庭不稳定的程度。通常农村的传统家庭都比较稳定的，城市里离婚率不太稳定，但是中国完全相反的，中国现在面临乡村的家庭危机是相当严重的。

我想问一下桑德斯先生，我知道发达国家的政府为了解决城市贫民问题做了很多努力，比如说根据福利国家的思路，很多国家都为穷人盖了很多的廉租公屋。但是廉租公屋区后来发生一个问题，大量的穷人集中居住在一个地方，虽然这些公屋外观很漂亮，绝不是棚户，比我们国家的商品房小区并不差，但是这只是指的建筑外观，人文环境是很差的，犯罪率极高，有的地方甚至那些人都不敢进去。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像美国这样的国家，这二十多年来实现希望计划，实际上是建立混合收入社区，把穷人的房子不是集中建在一个地方，而是分散插花的建在中产阶级的地方。但是这二十多年来效果也很不好，道理很简单，在美国这样的国家，如果

你要说服中产社区，接受政府在这里盖穷人安置房不是很容易。更重要的是，政府即使做到了把穷人安排到这里，他也不能防止富人搬走，因此在美国很多地方政府在那里盖了穷人房，富人就纷纷搬走了，过了一段时间又变成穷人聚居的地方。所以这个办法好象也不是非常有效。一直到现在，美国政府也没有非常成熟的解决办法，不知道桑德斯先生您认为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为好？

道格·桑德斯：在大部分的欧美国家从乡村背景迁移到城市背景的过程中，大部分欧美乡村已经完成了完整的城市化过程，他们现在经历的是人口缩减的现象，人口反而变少了，所以他们可能会依赖一种国际移民，比如说从土耳其、非洲的一些农村人口迁移到西方的城市中去。我在多伦多和洛杉矶长大，我也曾经住在这样的社区里，其中就有来自葡萄牙、中国和墨西哥的移民，在这样的社区中有很多政策性错误，其中的人们会惊恐的发现来自摩洛哥、土耳其的人占据了他们的社区，他们通常得不到好的教育支持，好的交通设施，唯一来自政府的支持就是警察的分布率比较高，他们也没有完整的公民权。其实他们需要的只是开始自己的小生意，把自己的孩子送进大学，获得一些基础设施方面的支援，使自己获得发展的机会。如果他们能够拥有完整的公民身份，在城市中立足的话，这些贫困现象就会得到很好的解决。其实城市中的贫困现象并不是因为有更多的穷人搬进来，而是因为他们在发展的过程中受到了阻碍。

主持人：下面进入读者提问环节。我首先对桑德斯先生有一个问题，您刚才也说到在城市化进程中会出现一个现象，在西方国家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已经凸显出来，会极端的缺乏劳动力去支持老龄化人口的国家福利政策和养老计划。您在书中提到的落脚城市和外来移民是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因为外来移民也会终究转变为城市人口，在所有国家地区的城市化进程全部终结以后，这个世界会发生什么？是会出现奥威尔的 1984 还是出现美丽新世界？

秦晖：我觉得依靠外来移民养老，在欧美国家会受到非常大的阻碍，尤其是在欧洲，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欧洲要接受移民，受到的阻碍越来越大。我倒觉得将来很可能延长退休时间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中国离这一步还太远。中国现在不是怎么养老，而是这些年轻力壮的人我们都不能容得他在城里呆下来。养老问题在农村比在城市还严重。

道格·桑德斯：的确在西方一些国家现在退休年龄已经延迟到 65 岁甚至以上，当然因为现在的人寿命更长了。但是我们想知道的是这有没有结束的一天，现在家庭的规模已经变的越来越小，甚至在伊朗这样的国家从之前的每户 7 个孩子变成现在 1.7 个孩子。这还是不怎么去控制生育的宗教国家。现在人口还在快速增长的国家只剩下冲突非常严重的国家，比如像阿富汗和也门，而整个世界来说已经进入稳定的人口递减阶段。这样一种失控现象不能完全在我们这

一代得到解决，可能要到下一代，如果我们现在来看的话，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以前他们会觉得中国人口增长非常快，总有一天他们会充满这个世界，但是实际上我们已经比较接近人口紧缩的现象，移民会往更好的经济机会的社会去迁徙，这样一个处境跟石油价格升到高峰的现象比较类似，达到一种人口高峰现在可能往下滑，年轻人的移民可能短暂的补偿人口损失，但是从长远来说很快他们所迁移到的国家人口增长也会慢慢的停滞下来。

提问：请问秦教授，怎么看政府提出的 3600 万套保障房对城市化的影响？

秦晖：这个 3600 万保障房，如果真的具有保障功能的话，至少是很好。但是真正大的问题，所谓的保障房是不是具有保障意义。我们最近都知道重庆出了事，很多人说重庆出了事是因为太左，比如其中有一项号称叫做民生大跃进，搞了很多东西。但是重庆的民生大跃进大家不要误解，这绝不是福利大跃进。重庆盖了很多保障房，这不是廉租房，重庆政府制度写的清清楚楚，这些房是公租房，而公租房的定义是房租水平是市场化，没有优惠的。而且申请公租房的标准也没有要求，什么人都可以申请。讲的简单一点，这个房没有福利意义，也没有保障意义，但是它的名字叫做保障房，国家投了很多钱，实际上这是国家用凯恩斯主义刺激经济增长的做法，不是社会保障公共福利。重庆不管我们怎么评价它，有一点是肯定的，我并不认为它是左的典型，按照世界上对左的定义的话。重庆的问题很多，但是这个问题恐怕不能说是所谓的左。像这样的公租房对解决农民工的住房不可能起到什么实质性的作用。如果租它的人很多，这些人政府强制他出高地租，把他们的打工收入相当一部分交给国家。最可怕的是，如果这个房租高到没有什么人租得起的地步，将来公租房的空置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我们中国去讨论福利制度究竟是好还是坏，这个可能都太奢侈了。因为中国根本没有所谓的福利制度，中国一项只有把福利和特权挂钩的制度，这种制度我把它叫做负福利制度，也就是这种福利制度是扩大不平等，而不是减少不平等。我们首先是要走出这种状态。

提问：请问秦老师，中国未来会不会因为城市化过度而变成一个大灾难？城市化是不是中国人民脱贫的唯一方法？

道格·桑德斯：我们在说的城市化就是现代化的一个代名词，从一个会受饥的农业状态达到温饱状态这样一个发展过程。实际上使农村经济达到自给自足的水平需要的人并不是那么多，农业人口只需要 4%-20%。世界上农业生产效率最高的国家反而是农业人口占比例最低的，大概只有 4%-5%。需要进口粮食的国家，他们的农村人口达到 35%，但是他们仍然不够用。像加拿大粮食进口率是另外一个国家数倍之多，他们的农村人口只达到 4%。所以一旦农村发展必然导致城市化，因为农村人口必须离开农村土地进入城市。如果这样想的话好象是城

市化导致了农村的迁徙，实际上是因为农业的发展而导致城市化，这是另外一个方向。如果政府政策在这期间没有起到很好的支撑作用的话，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就会酿造出革命暴动的后果。所以我们需要处理好城市化现代化的过程就必须去考虑一下，就算是城市里最差的贫民窟之中，他们的收入水平也可能是乡村的 20 倍之高，他们可能会拥有更长的寿命。比如在中国大部分乡村收入都是来自落脚城市居民寄回家的工资收入，这样的情况在波兰、摩洛哥等国家也一样。

秦晖：关于这个问题很简单，第一，所谓过度城市化的灾难这个概念到底是不是成立是一个问题。即便这个概念是成立的，中国现实的问题也不是什么过度城市化的灾难，而是阻碍城市化和扭曲城市化造成的问题。我刚才讲的三亿离散家庭的存在就是一个例子。第二，城市化是不是农民致富的唯一途径？我觉得"唯一"这个词可能很严重，但是也许这个问题是一个假问题，每一个人的致富途径是什么应该由他们自己来回答，不能由政府来回答，你必须这样致富你不能那样致富，如果是这样肯定会造成很大的问题。

提问：现在城市化的过程当中，咱们国家城市化规划是中小城镇化的概念，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城市群和中小城市化，政府在规划当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城镇化应该是自然演进还是政府规划的结果？或者说政府在这个过程当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恪守什么样的边界？目前我的一个实证的想法，很多正义的制度是有效率的，但是农民工的制度已经影响中国经济效率的发展，不知道二位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秦晖：农民工制度是不是正义的制度要看你跟什么比较而言，跟建立在公民权平等基础上的正常用工制度相比显然是很不正义的，这也是我们不满意的一点。这比起以前毛泽东时代农民一进城就面临被抓的危险，在 1970 年就曾经被收容过，尽管我也是出生在城里的，但是那时候我是知青，没有带证明跑到另外一个县就被抓起来了。那个时候中国农民连暂住证都没有的，你如果进城，根据你每一次的事到政府部门开证明，比如你要看病，就给你开一个去看病的证明，你要买什么农机零件，就要开一个农机零件的证明，只管一次的，从来没有给你开一个在城市呆上一年在那里找工作，连这个自由都没有的。如果跟那个时候相比，农民工制度其实也是一种进步，比那种农民完全没有移动自由的状况好多了。中国经济增长其实有一部分就是因为这种进步。在这个意义上讲，农民工比毛泽东时代对农民的态度正义性还是增加了一点点。当然我们不能满意。至于你刚才讲的第一个问题，我们国家对农民进城从来都是步步退让的，你讲的中小城市化是八十年代我们政府一再强调的。我们一开始说农民应该离土不离乡，他们应该就地转业。后来就地转业控制不住，又说他们可以离乡，但是应该就近，应该进入中

小城市，这就出现了你刚才讲的这个说法。最近这十年我们已经不太讲这个，我们现在讲的是大中小城市均衡发展，而且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出现了城市化大跃进，不仅大城市在扩张，而且卖地财政本来就是政府推进的，现在我们的城市化已经都匪夷所思了，比如说现在中国大量的地区人为的搞几个城市合并，什么长株潭一体化，甚至连新疆那样的地方都在搞乌鲁木齐和昌吉连成一片，新疆那么不发达的地区都在搞特大型城市，所以今天的中国并不存在所谓的只发展中小城市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是对于进入城市的这些农民，他们应该得到国民待遇。

提问：不管是桑德斯先生还是秦晖老师，你们关于这个话题都预设了一个前提，就是城市化，这是一种趋势或者说也是一个现实。现在城市化虽然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也给很多人的生活水平带来很大的提高，农村人进城面对的压力非常大，城市人本身面对的压力也非常大，是不是意味着城市也不一定让生活变得更美好？我想听一下秦晖老师和桑德斯先生的意见，城市化是不是人类社会这种形态的最终目的？或者说人类社会最终会不会重返农村。中国的国学大师梁漱溟先生也是研究农村问题，他在乡村建设理论著作中指出乡土社会的伦理才是中国人真正的秩序，您怎么看待这个观点，您觉得是否有重过乡土中国的可能性？

秦晖：首先城市化是不是最好的模式我不知道，将来人类会有什么样的更大的创新我也不知道，但是有一点，假如有的话，也应该是人们的自由选择。政府把人们赶进城市和政府不准人们进入城市都是非常变态的做法，这个我们都不能接受。至于讲到乡村伦理，首先这是一个比较浪漫的说法。我们通常讲的乡村伦理，现在在城市保留的要比在乡村还要多，包括我们通常讲的传统家庭的稳定性等等，现在在农村遭到的危机比在城市严重得多。假如真的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也不能通过阻止农民迁徙来解决。

道格·桑德斯：我们对于乡村的想象是一种非常浪漫的想象，就像秦教授说的一样，我们把它罗曼蒂克化了，我们觉得我们的祖先来自那里，那是我们的根，会更愉快、更轻松、压力更少。但是实际上城市虽然有它自身的压力，他的健康水平以及各种性别权益都会相对于更好于乡村。乡村从世界范围来说会有更高的自杀率以及艾滋病的扩散，还有更高的婴儿死亡率，我们实际上把乡村进行了理想化的描绘。当乡村移民搬到城市之后他们会发现传统家庭结构的变化，他们发现男女双方都必须要开始工作才能支持整个家庭经济。尤其是妇女发现收入会高于她们的丈夫，而且他们的女儿也会更容易比儿子成为更加成功的人。这种迁入城市的进程促进了性别的平等以及种种类似的改进。

主持人：我们今天互动的环节到这里结束，非常感谢各位读者来参加我们的活动。



（道格·桑德斯，英籍加拿大记者，《落脚城市》作者。秦晖，学者，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原文链接：https://cochina.org/?p=6501）

【返回目录】

8-4 片桐惠子：日本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社区经验

“参与社区活动减少，很有可能会削弱城市社区成员间的联系。再加上家庭成员间的联系变少，容易导致老年人，特别是在大城市中的老年人，产生社会孤立感。1980-2009 年，日本老人家庭结构出现了非常明显的规模缩小。这些老年人与他们孩子的接触是下降的，如果他们分开居住，特别当他们的孩子结婚以后，接触就更加少了。”

据联合国估计，至 2020 年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有 60%是在亚洲。亚洲国家的城市化问题很可能在将来比现在变得更加棘手。尽管，城市化会带来一些好处，但是它也会带来负面效应，如大城市的人口老龄化问题。

首先我要给大家介绍日本城市。其次，在日本我们有这样一种现象——社会资本的下降，我要给大家介绍社会资本下降带来的一些结果。最后我会谈老年人在城市中被社会孤立的风险。

日本城市中老年人口的增长

研究显示，日本的老年人口增长很快。在 1920 年，日本只有 18%的老年人口，但是到 1970 年已经有 30%的老年人口。在 21 世纪初叶，日本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 40%。其中有多个原因。一个是“婴儿潮”一代迁徙去城市，另一个原因，就是城市提供给老年人的友好设施的吸引。

在日本，“婴儿潮”的定义并不明确，但是核心概念是指 1947 年到 1949 年出生的人。他们这一代人口超过 1000 万人。日本“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走向了老龄化，现在他们也更多地进入了城市地区。这一代“婴儿潮”和其他的几代人是不一样的，他们有更高的教育水平，他们更多向城市迁移，他们在公司中工作的机会也就越多。2007 年，这些“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达到了 65 岁退休的年龄。日本政府当时有一些政策，提出即使他们达到了 65 岁的退休年龄，他们还有机会继续工作。第二个，老年人也是比较喜欢住在城市，他们过去住在农村，但现在越来越发现在城市当中有很多的设施、卫生条件对他们有更大的吸引力，还有交通也更加便利。

社会资本的下降

尽管有非常便利的基础设施，城市区域仍有一个问题，就是社会资本的下降。在我的研究当中，这个概念是指能够促进经济或非经济产品生产的社会关系。把日本老年人的社会参与度作为一种虚拟的社会资本，并指出社会孤立是社会资本下降的结果。

我们研究了练马区（编注：东京 23 个特别区之一）社会参与度的变化情况，对比了 2002 年和 2008 年间，60 多岁已婚调查对象的数据。研究显示，在六年时间里，男性和女性的社会参与度都有很大的下降。一个合理的解释是，日本经济的衰退，随着经济状况变差，人们没有闲钱可以参与团体活动。特别是女性，因为丈夫的收入减少，必须工作来补贴家用。第二个原因是近年来人们的个人意识逐渐取代了集体意识。二战后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的出现使家庭规模缩减，改变了日本的家庭结构，成员之间的关系也疏远了。尤其是“婴儿潮”一代更乐于小家庭的生活方式，而非传统大家庭体系生活。他们似乎不喜欢参与团体活动，尤其是那些正式、强制性的团体活动。

逐渐弱化的社区成员联系

参与社区活动减少，很有可能会削弱城市社区成员间的联系。再加上家庭成员间的联系变少，容易导致老年人，特别是在大城市中的老年人，产生社会孤立感。1980-2009 年，日本老人家庭结构出现了非常明显的规模缩小。这些老年人与他们孩子的接触是下降的，如果他们分开居住，特别当他们的孩子结婚以后，接触就更加少了。

我们做过一个调查，关于不同国家老年人和孩子的联系频率，主要研究五个国家：美国、日本、韩国、德国、瑞典。日本的接触率是最低的，在日本缺少孩子跟家长之间的亲密接触。同时，老年人和社区之间的接触也下降了。日本的老年人和社区接触，在上述五个国家中也是最低的，并且日本的恶化趋势有所加剧。这些老年人和他们的孩子是分开住的，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特别需要邻居的照顾。但是，我的研究显示，和社区成员联系很少，使得老年人想要需求帮助也比较困难。社区的网络联系很重要，因为社区的邻居不仅是日常帮助的来源，同时在关键时刻也提供重要的紧急援助。

促进就地老化

家庭和社区联系，这两个原始族群曾经最强大的联系纽带正在削弱，因而老年人存在被社会孤立的风险。在日本到处可以观察到这种趋势，一些报告显示，大城市老人社会参与率低于农村。这表明在城市的老年人被社会孤立的风险更大。我们需要避免目前已比较脆弱的联系在

今后变得进一步脆弱，所以我们必须在社区居民之间增强联系。现在我们面前的挑战，是要确保老龄化社区有可持续发展。

从老年人通常在社区老去（Aging in Place,就地老化）这个事实来说，社区网络尤其重要。然而，城市化是很难阻止的。如果城市化必然带来弱化的关系，我们怎能提供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老龄化社会？扩大家庭规模和家庭成员之间实现更强的联系，几乎是不可能的。比如，日本政府曾经多年出台各种政策，来阻止人口出生率下降，但是还是失败了。

应对城市化以及城市化不可避免带来的关系削弱，有一个可行方法，即促进社区成员间的交流，发展社区内的网络，通过它人们可以培养社区意识，并在此结交社区朋友。在日本，已经实施了一些促进社会活动的方案。然而，这些方案多数是提供给农村老人的。例如，老人俱乐部——这些为老年人服务的传统社会俱乐部，数量在减少。因此我认为有必要重新研究老年人的思维方式，并且发明符合城市老年人需求和口味的活动方案。

（片桐惠子，日本兴亚福利基金会社会老年学研究所教授。原文链接：http://www.dfdaily.com/html/8762/2012/6/12/806495.shtml）

【返回目录】

8-5 卞中佩、陈慧敏：台北的城市化与拆迁



“台北，徘徊在新与旧的十字路口，对外，在全球都市的竞争压力下，台北市有快速更新的压力，然而，对内，却有民众对都市更新的想象和摸索，以及要求弱势优先、尊重民主程序的压力，台北市的都市更新不得不再度放缓脚步，重新调整步伐。快与慢的步调如何抉择，新与旧的十字路口怎么转弯，台北市都市更新的下一步要怎么踏出去，是台北目前面临的最大考验。”



士林文林苑“钉子户”王家拆除前夕，不少支持王家的社会人士和师生前来声援，在房屋前挂上抗议白布条。



士林文林苑“钉子户”王家被台北市政府强制拆除之后，建商架起了围篱，不过，声援民众将围篱锯开，进入已成废墟的原址，搭起帐棚与临时屋子，准备长期抗争。



乐生疗养院所在的山坡地被捷运工程挖空、破坏，原有完整的园区支离破碎。（摄影：郭志荣）

SOHO 中国大陆首席执行官张欣在博鳌论坛的城市论坛，提到了她四年前首次到台北的第一印象，她说：“当时我非常吃惊，这个城市非常古老。”代表台北市长郝龙斌与会的台北市副

市长丁廷宇尴尬地解释，台北市的都市更新虽然缓慢，但是也累积出友善、体贴、文化深度等特色。

张欣的一席话，的确刺痛了台北市最敏感脆弱的神经，她可能并不知道，坐镇在台北市的郝龙斌，正面对他政治生涯的一场风暴。在 3 月 28 日当天，近千名警力强制拆除台北市士林区"文林苑"小区的一家钉子户。这座小区有 36 户居民同意建商（编注：即开发商，下同）把旧大楼改建为现代化的新大厦，却有世居六代的王家，希望保有充满家族记忆的老宅，反对参与都市更新。一拖四年，台北市政府援引"都市更新条例"，小区若有八成以上同意，不同意的少数必须搬离，动用公权力，强势拆除王家老宅，清除地基，交由建商进行改建工程。

为了顺利拆除王家老宅，警察必须抬走前来声援王家的三百多位市民，其中包括学生、老师、知名社会人士等，他们呼吁市政府尊重王家人的意愿，让王家人保存这栋充满记忆的老房子，他们不仅不认同郝龙斌拥有行政效能和执行力，反而痛斥他蛮横无理，同一时间，媒体舆论纷纷质疑台北市政府图利建商，"都市更新条例"可能侵犯了法律对人民居住权和财产权的保障。社会对台北市政府的拆除行动反弹极大，甚至冲击到台湾地区的都市更新政策，不得不重新检讨"都市更新条例"。

这一场"钉子户"的拆迁行动，再度挑起了台北对于都市更新的复杂情结。台北，正徘徊在新与旧的十字路口上，找寻城市发展的下一步。

渴望破旧立新

台北是移民的城市，从日本殖民统治到光复，成为台湾的政治经济中心。随着 1970 年代台湾经济起飞，大批移民离开中南部的农村家乡，到台北打工求生，移民背景之下的台北，充满了错落的违建聚落和违章建筑，整座城市缺乏规划，房价也同时居高不下。

在 1980 年代末、1990 年代初，台北曾出现第一波的城市更新与改造浪潮。当时，"政治戒严"刚刚解除，开放民众出国观光，打开眼界的台湾居民，看到世界各地城市的现代化，心中顿生向往之情，同时，同属"亚洲四小龙"的韩国，在 1988 年举办汉城奥运之后，成功将城市大幅整顿成美轮美奂的现代化都市，让台湾更生羡慕，当时的台北市市长黄大洲在民气可用之下，拆除紧邻西门町的"中华商场"。中华商场原本是为了安置随国民党迁台的居民，占据道路面积建筑的违章商场，低价分租给这群居民做小生意。中华商场拆迁之后，当地的道路拓宽，成为林荫大道。同时，黄大洲也把安置一千多位国民党老兵的一块土地，划为十四、十五号公园预定地，就是如今的位于豪宅区的大安森林公园。

这两个都市更新案，虽然都引发当地居民的不满和抗议，不过，却没有引发台北市民的同情与支持，反而是黄大洲被认为行政效率不彰，他温温吞吞的形象深植人心，当时的台北市民期待一位有魄力的市长，能够破釜沉舟地推动都市更新，为台北带来焕然一新的气象。因而，在 1994 年黄大洲与陈水扁竞选台北市长宝座时，民进党的陈水扁以“快乐、希望、台北市”的口号，打败了国民党支持的黄大洲。

小区主义和弱势优先

陈水扁在台北市长任上四年，在中产阶级的期待下，大刀阔斧改造台北市，大力扫黄、扫黑，并且积极整顿市容景观，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政绩”就是拆迁十四、十五号公园预定地上的一千多名住户，铲平违章建筑，改建成大安森林公园。

这块公园预定地，在日据时代是坟场，后来由迁台的老兵和眷属搭建违章建筑，就地落脚，安顿生活，他们已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了 40 多年，违建区住户形成了小区，有绵密的人际互动，大江南北不同的语言和生活习惯，反而让彼此相互尊重，并且在生活上互助合作，自发成立防火巡守队，拥有浓厚的小区情感。然而，这片违章建筑却与邻近的高档住宅并不相衬，成为台北市政府“整顿市容”的首要目标工程。

当陈水扁派了推土机来到这片贫民窟时，整个小区强力反弹，激烈抗争，一名老兵以自杀控诉拆迁，震撼了社会，陈水扁展现铁腕，最后仍强制拆除这一片违章建筑，成为他在 1998 年竞选连任败选的原因之一。

大安森林公园最终仍旧成为绿草茵茵的公园，但这个拆迁案却引发了台北市民对于小区运动、弱势保护的争辩和思考。对城市发展规划有深刻关怀的台大城乡所师生介入这场拆迁案，声援居民的抗争行动，他们提出，在都市发展与规划之中，应该要保护弱势族群的利益，把这群老兵和眷属安置在冰冷、缺乏小区脉络的高楼大厦之中，破坏了他们原本紧密而相互照顾的小区脉络；应该尊重他们原本的生活机能，公权力不应强迫他们拆迁。这些论述让台湾社会对于都市更新，注入了新的思考，不再盲目追求市容整顿，而开始关注到弱势保护和小区保存。

在这个拆迁案发生的同一时间，另外一场台北市永康小区的老树保留运动，也给台北市的都市更新，带来了不同的想象和可能性。紧邻着十四、十五号公园预定地的永康街，是一个由官舍及中产阶级公寓结合而成的小区，结合服务当地居民的当地特色小商店，是台北典型的住商混合小区。台北市政府当时打算拓宽小区内的小巷道路，计划迁移 50 棵老树，并且使用原

本已经非常狭小的永康公园五分之二面积。小区居民则希望能保留老树和公园，不希望大马路带来车流和过度的繁荣，破坏了原本小区的静谧。

永康小区居民通过集体的力量，不断跟陈水扁主政的台北市政府陈情沟通，台北市政府终于妥协，同意保留老树及公园，永康小区的运动，并没有因为达到原本的目的而画下休止符，反而进一步深耕，组成小区发展协会，共同思索和规划永康小区的发展。永康小区自发性地保留老树和公园运动，成为台湾都市小区运动的滥觞，并向外扩散，也打破了都市更新是由政府全权主导规划的模式，开始有了小区和住民参与决策的空间。

乐生疗养院保存运动

十四、十五号公园预定地拆迁抗争和永康小区运动的两个事件，犹如星星火种，点燃了台湾社会对于都市更新的另类思考，直到乐生疗养院的保存运动，更直接引爆了弱势族群对于都市更新霸权的挑战。

乐生疗养院是位于大台北新庄地区的边缘山坡，日据时代开始，当时被误认有传染性的麻风病人被带离家乡，强制收容到这里。“国民政府”迁台之后，延续这项麻风病政策。乐生疗养院区内，完整保留日式建筑风格的医院，以及绿树围绕的平房，被迫与世隔离的麻风病人，彼此互助，形成亲密的小小区，不料，当台北的捷运兴建工程不断延伸到台北边缘地区，带动邻近的房地产开发，乐生疗养院却被规划捷运公司作为维修、停放列车的机厂及发电站，台北县政府和捷运公司计划征收乐生疗养院的土地，而要将五百多名麻风病院民搬迁到邻近的医院大楼。

不想搬离院区的乐生院民，引起了社会高度的同情与关注。从 2004 年开始，学校师生、学者、都市规划与建筑专家、公共卫生专家、人权团体、小区运动工作者等，纷纷投入乐生院的保存运动，他们以艺术、市集、教育、抗争、游行等各种手段和方式，希望争取保留乐生院。他们主张，兴建捷运（编注：即轨交，下同）的公共利益，不应该高于人权，都市规划和捷运应该要变更设计，乐生院民在错误的公共卫生政策下已被牺牲了一次，他们有权利在乐生院安居。

由于捷运在规划时期，就已经吸引建商在捷运行经路线购置土地，等候地价上涨。建商更是地方政治人物的重要金主（编注：赞助人），政商关系紧密而盘根错节。因此，纵然乐生院民和声援的群众提出捷运兴建的替代方案，地方政府和建商却以动员当地民众发动另外一场游行来反击乐生院，中央和地方政府最终决策，同意保留部分的乐生院区。

乐生疗养院的保存运动虽然没有成功，台湾社会却不再是一面倒地支持都市更新，而有一个另类的声浪，重新思考着，都市更新并不是把旧房舍拆除殆尽，而应该思索如何保留旧有历史与文化，更重要的是，都市更新的决策过程，不应该是少数人为多数人牺牲的模式，多数人的公共利益不能压制少数人的生存权利。

挑战建商主导的都市更新

这股在台湾民间逐渐茁壮的反思力量，其实就是士林文林苑“钉子户”王家一家人，能够在短短时间，就吸引到三百多名师生、社会人士前往声援，媒体舆论同情的社会基础。王家和前去声援的群众已经开始在被拆除的废墟上搭起帐篷，并打算兴建铁皮屋以长期抗战，并计划举办各种讲座及活动，他们不单是为了王家人出一口气，更直接提出对“都市更新条例”的批判，以及对台北市政府铁腕执行拆迁的不信任和质疑。

地狭人稠而房价居高不下的台北市，成为建商引用“都市更新条例”，主导小区重建的主要地区。“都市更新条例”原本的立法精神，是希望小区居民通过自主讨论，凝聚小区共识，规划出小区发展的想象，再寻找营造商合作，进行整修或重建。不过，经过多年的实际推动，却越来越偏向由资金丰富的建商主导，小区居民被动配合，但由于小区意见整合不易，建商通过游说立法，逐渐扭曲了“都市更新条例”原精神，为了扫除可能的社会冲突，条例也改为若能取得八成居民同意，公权力就会介入协助拆迁，以加速完成更新重建工程。

这一次士林王家的事件之所以震撼台湾社会，主要在于民意反对政治人物与建商之间的勾结太深，并且批评“都市更新条例”求取速效更新，无视于民众的基本人权及小区价值，并且将都市更新的民主精神破坏殆尽。

这股质疑和批判的声浪更指出，建商主导的都市更新模式，并不能解决台北都市规划杂乱无章、街景失序的现状，反而会加深发展失序的问题。因为建商寻求改建的小区，多位于地价高的地段，而真正需要都市更新的穷困地段，并非建商所青睐的目标，同时，建商仅负责单一建筑，无法形成整区的重建规划，又以商业利益为考虑，对建案的规划，以市场商品需求为主，无法兼顾历史、文化、居民需求等社会文化面向。

小结

台北，徘徊在新与旧的十字路口，对外，在全球都市的竞争压力下，台北市有快速更新的压力，然而，对内，却有民众对都市更新的想象和摸索，以及要求弱势优先、尊重民主程序的压力，台北市的都市更新不得不再度放缓脚步，重新调整步伐。快与慢的步调如何抉择，新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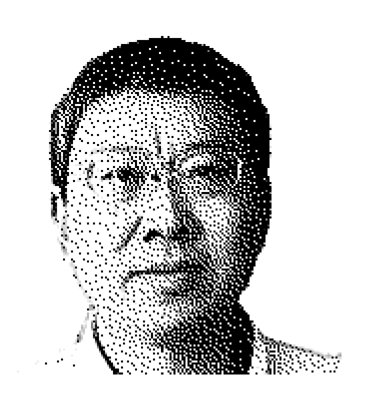
旧的十字路口怎么转弯，台北市都市更新的下一步要怎么踏出去，是台北目前面临的最大考验。

（卞中佩，美国德州农工大学社会所博士生。陈慧敏，台北媒体人。原文链接：http://www.dfdaily.com/html/8762/2012/4/24/781192_2.shtml）

【返回目录】

【权】

8-6 徐贲：没有“市民权利”就没有城市



“但是，从农村进入城市的移民，往往成他们新生活世界里的“外来人”和“下等人”，他们与其 他市民的同等权利很难得到保障。他们和城市的其他“下等人”一样，为起码的温饱而挣扎，根本无暇考虑到自己的市民权利和市民文化。世界上许多大城市所存在 的“贫民窟”，便是这些下等人的集居地，成为“丑恶的都市化”的特殊景观。”

2 月 14 日《人民日报》报道，统计数据显示，2009 年中国城镇化率已达 46.59%，只用 30 年时间就赶上了西方 200 年的城市化历程。在这个加速的过程中，非自然的城市化存在着两个层次上的公民权利伤害。

第一个发生在强行征地和拆迁的过程中。不少城市化是农村土地变成城市用地的结果，许多农民和他们的后代，因此永远不得不成为“市民”而另谋生路。第二个发生在难以成为真正市民的生活状态之中。许多进城打工的农民被迫成为“亦工亦农、亦城亦乡、颠沛流离、候鸟一般的‘两栖人’”。如果城市化难以避免，侵犯公民权利却是可以避免的。如果第一层的伤害已经造成，至少可以用避免第二层伤害来减轻第一层的伤害。

说到城市化，我要讲一个故事。

一位朋友到美国来访问，谈起对我居住的湾区城市的印象，说除了旧金山，像伯克莱和奥克兰这样的“城市”，在中国只能算是乡下。美国的许多城市确实没有中国城市那种喧闹、繁华、熙攘的外貌，既没有高大的建筑，也没有宽阔的街道和鳞次栉比的商店，更明显的是街上很少能见到一堆堆的行人。

在美国，旧金山地区算得上是一个高度“城市化”的地区，这种城市化主要是就公民的“市民生活方式”和“市民文化”而言。住在城市里的居民没有任何户口的限制或身份的区别，所有居民都有机会参与城市的公共事务，如社区计划的听证会，选举时的投票或助选、慈善和义工活动、出版社区小报等。所有居民也都可以平等享受市民的权利或服务，如投票选举学区代表、市议会成员，免费的公立学校，社区图书馆，或贫 困户社会福利。

美国西部的许多城市是随着工业化的进程而自然发展起来的，在 20 世纪初，奥克兰就曾是美国西部铁路的一个中心，许多从事与铁路有关工作的人住在这个地方，渐渐发展出一个城市来。奥克兰大多数的居民曾属于“蓝领阶层”，所以这一带的房子都不大，一般是两三个卧室，加上厨房和饭厅，一个浴室兼厕所。但是，每栋房子都有一个开放的前廊门庭，这个开放的前廊门庭见证着 20 世纪初市民交往的空间和方式，那时还没广播，也没有电视，前廊门庭是市民们聚会交流、传播消息、议论事情的地方。

城市生活使得市民们能便利地相互交往，及时参与跟他们有关的共同事务，这是历史上市民文化与共和政体能同步发展的主要原因。无论是古希腊的城邦，还是中世纪意大利的城市共和国，市民自治都是这样形成的。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中的人们享有一些共同的 “市民权利”。罗马的公民分成“自由民”和“奴隶”，是以财产来区分的等级身份，但两种身份的公民都享有相同的法律权利。“市民权利”后来演化成国家范围 内的“公民权利”，仍然叫作 civil rights。

“市民权利”或“公民权利”都是以所有人相同的“人”的平等为基点。如果某些权利不能为所有的市民或公民所共同拥有，那就成了一部分人的特权，成为一个城市或社会的不公不义的规定。

现代城市化并不总是与现代“公民权利”一起同步发展。在西方，19 世纪后快速的城市化伴随着工业革命而发生。这种城市化起因于农民自行选择的“逃离农村”。农民进入城市是为了寻找更好的经济发展机会，人口流向城市是由于农村和城市的生存和发展机 会差距所造成的。农村靠天吃饭，劳动收效低，生存艰难，相比之下，城市能提供工作机会，还有比较好的就学、医疗条件。

但是，从农村进入城市的移民，往往成为他们新生活世界里的“外来人”和“下等人”，他们与其 他市民的同等权利很难得到保障。他们和城市的其他“下等人”一样，为起码的温饱而挣扎，根本无暇考虑到自己的市民权利和市民文化。世界上许多大城市所存在 的“贫民窟”，便是这些下等人的集居地，成为“丑恶的都市化”的特殊景观。



“丑恶的都市化”是一个社会正义问题，不只是一个人口和资源的“大城市病”问题。都市化使人口和资源向大城市过度集中，但是，这些资源却没有能够由在城市中的所有人口共同分享，这就像世界财富虽然在向一个国家流动，但这个国家中的许多人民却并不能分享这些的财富。没有平等的“市民权利”，就没有一个好的城市，同样，没有平等的“公民权利”，也就没有一个好的国家。

（徐贲，美国加州圣玛丽学院英文系教授。原文链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acf1f30100or5u.html ）

【返回目录】

8-7 简·雅各布斯：地区管理和规划



“一个大城市的公开听证会会是一件让人感到很蹊跷的事，一方面会让你感到很沮丧，另一方面也会让你感到很振奋。”

一个大城市的公开听证会会是一件让人感到很蹊跷的事，一方面会让你感到很沮丧，另一方面也会让你感到很振奋。我了解最清楚的是在纽约市政大厅里的听证会，每隔两周的星期四进行，这些听证会都需要城市的主要管理机构，裁定委员会做出决定。出现在听证会当天议程上的内容在此前早已由政府方面或者是政府以外的代表拟定。那些希望说说他们的想法的市民可以针对市长、五个区的区长、市议会主席发言提问；这些人坐在一个位于宽敞漂亮的房间一端垫得高高的半圆形长椅子上，屋里面摆满了教堂里常见的、给公众用的白色靠背长椅。公共官员，无论是民选的还是任命的，都会面对坐在椅子上的公众，反对或者赞同一些有争议性的提案。有时候，这些听证会开得很快，气氛也很平和；但是，另外一些时候气氛会非常激烈，时间会延续一个整天，甚至会一直延长到夜晚。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一个街区接一个街区、一个地区接一个地区的问题，一个又一个有头有脸的人物都会在这个屋里面生龙活虎地展示他（它）们自己。委员会成员们侧耳倾听，或者打断插话，有时候则当场就下达一些指令，就像是中世纪那些握有法庭控制权的裁决者。这种听证会深深地吸引了我。我就像着迷似的去参加这些听证会，并且坚定无误地表达我自己的倾向。每当别的地区的问题在这里提出，或者是别的街区在这里为其奋斗目标提出理由时，我都会积极给予声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整个过程会让人非常窝火。已经有很多城市问题在这些听证会上被提了出来，但还是有许许多多另外的问题永远也不会有机会在这里得到表达。从这些听证会上可以知道，其实只要政府部门的一些“心怀好意”的人，或者是一些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行政部门能够更好地了解一下他们的方案和计划会对某些街道和地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或者是他们至少能关心一下那些地方的市民所想的生活的价值是什么，为什么是这样，那么就不会有这么多的问题出现。如果规划者们或者是一些所谓的专家们能够稍稍了解一下城市的运转机制，并对这种机制表示一点起码的尊重，那么很多的冲突就永远不会发生。另外一个情况是，

有些冲突和问题来自行政部门的武断和偏袒行为，这种行为会激怒一些选民，但他们往往找不到合适的地方来表示他们的不满或纠正这种行为。在还有很多情况里（不是所有的），很多人做出了巨大努力来参加这些听证会——如很多人（多达几百人）损失了一天的工钱，或者是需找人看管他们的孩子，或者是把孩子一块带来，在他们的腿上坐几个小时（孩子们则会难受的不得了），但最后会发现原来是一个骗局。所有需议论的事情在事前已经做出了决定。[1]

比这更加让人沮丧的是，我们了解到一些问题，却知道大家都对它们无能为力。这些问题会引出更为复杂的问题；各种各样的要求，解决方案会缠绕在一块，纠缠不清，根本无法弄明白；更不用说这些要求和解决方案本身还会受到政府庞大机构中不同部门的抨击。

整个情形就像是瞎子摸象。无可奈何和做无用功这两种感觉是在这些听证会上最大的收获。但是，在另一方面，这个过程也有让人振奋的地方。如此众多的市民表示出的诚意，以及这种强烈的诚意带来的鲜活的生命力，都是让人振奋的理由。一些非常普通的人，包括穷人、受歧视者和未受教育者等，会抓住这个机会表现他们自己，就像是一些有名望、有思想的人在表现他们自己一样，我决没有任何讽刺的意思。在谈到他们最为熟悉的生活中的东西时，这些人的言语非常有智慧，而且很雄辩。在提到一些他们所关心的事情时，他们会显得很有激情，这些事情都与当地有关的，但决不是狭隘的小事情。当然，他们所说的内容中也会有一些愚蠢的、不真实的、自私的东西；但是，看看这些言语产生的效果本身也是一件有益的事。我想，我们这些听者是不会这么容易就受到影响的，重要的是我们应该理解并且正确估量他们的情绪。在城市生活、职责和担忧方面，城市里的人最有发言权，当然会有一些愤世嫉俗、言过其实的地方，但是也有真知灼见和坚定信念之处，而这正是最有价值的东西。那八位坐在垫得高高的长椅上的裁决者（我们不能把他们称为公仆——这是政府的习惯称呼，因为公仆应该更多地了解主人的事情）并不只是摆设而已。我想，大部分在场的人都会对此表示感谢，即我们至少有了这么一个难得的机会——尽管不是常常能够达到目的，要求这些裁决者保护我们免于受到那些所谓的专家们的简单化、一刀切方案的影响。我们尽量遵循这些裁决者的决定。他们的智慧、能力、耐心和通情达理的程度在总体上来说还是可信赖的。我并不认为有什么理由要去找一些比他们更好的人来替换他们。他们不单要做一些区区小事，更是要成就很多惊天伟业（不是让大人使唤的孩子，而是听从巨人召唤的成人）。问题是他们试图以一个组织结构的形式来处理一个大城市的细枝末节的事，即通过这样的组织来获取支持、建议、信息、指导原则等。这恰恰是最不合时宜的事。这不是说要有谁为这种情况负责，也不是说谁在推诿责任。如果确实有一个责任者的话，那就是我们的社会组织结构在适应历史变化的发展上的落伍。

这里所说的历史发展变化不仅仅是指城市在面积上由小到大的变化，而且也是指城市的管理范围的急剧扩大——住宅、福利、卫生、教育常规规划——这些都已成了大城市的政府要面对的方面。在管理和规划的功能上，很多城市未能做出相应的调整以适应这种变化。在这个方面，纽约并不是独一无二的。每个美国的大城市都面临着同样的很难跨越的横栏。当人类社会在事实上达到了一个新的复杂层次时，一个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有维持这种复杂层次的手段。而其对立面就是路易斯•芒福德所说的“建设停滞”（unbuilding），也就是一个已经达到了这种复杂层次，但不能做到维持这种层次的城市的命运。今天，我们所看到那种简单化、一刀切、不通人情的所谓的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就是一种典型的城市“建设停滞”现象。尽管这种形式与一些极端保守的理论的支持不无关系——实际上是强化了这种现象，但是这种规划形式的实践和影响却并不只是停留在理论上。随着城市的管理机构越来越与城市的发展和复杂程度的提高脱节，随着这种过程不知不觉和一步一步地深化，对城市规划和其他管理机构的人员来说——他们也是在试图完成惊天伟业，这种“建设停滞”形式的情况尽管有害，但实际上已经不可避免。城市所有的实际生活方面的需求（且不提经济和社会方面的需求），以及对这些需求的解决方案——常常是一刀切、死板僵硬、造成很大浪费的方案，都需要通过这种管理体系来处理，但问题是这些管理机构并没有那种理解、处理和估量城市独特、复杂和互相关联的无穷无尽的细节的能力。比如，我们可以来看一看城市规划应该首先瞄准什么目标，如果其目的是提高城市的活力的话。目的是城市活力的规划必须要做到城市的每个地区最大程度地在形式和数量上刺激和催化各种城市用途，包括人口的多样性；一个城市要在经济上有所发展，社会生活充满生机，城市本身魅力无限，这是基础的基础。要想做到这一点，规划者们就必须做出诊断，具体到每一个地方，研究到底是在哪一个环节上缺少多样性，然后尽最大可能帮助提供缺少生发多样性的条件。目的是城市活力的规划必须要促成一个以当地街道为主的街区网络的形成，最大程度依靠这些街道的使用者以及一些小企业主和小商人来确保城市公共空间的安全；同时通过这种方式来处理陌生人的问题，使得后者能成为一种资源而不是威胁；同样，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随时看护处于公共空间里的孩子。目的是城市活力的规划必须要消除那种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交界空旷地带，而且还必须要能帮助建立起人们与城市地区间的认同关系；城市地区的宽阔地域，内部交往和外部交往的复杂性和形式的多样，都会对解决大城市一些不可避免的、难以对付的实际问题提出挑战。

目的在于城市活力的规划必须要把非贫民区化为自己的目标，创造一些目的在于能够使得相当多的当地居住者——不管他们是什么人——选择自愿留在本地；这样做的一个结果是多样



性能在这些人中间逐步产生，并且在原有居民和新来的居民间保持社区的连续性。目的在于城市活力的规划必须要有能力把多样性自我毁灭和急剧性资金用途的局面转化为一种有利的、建设性的局面；一方面需要机会遏制破坏性势力的产生，另一方面则需要促使更多的城市区域拥有良好的经济环境，尤其是适应于不同的城市居民发展的经济环境。目的在于城市活力的规划必须要把澄明城市视觉秩序作为一个目标，但同时，必须通过促进和阐明实用功能秩序，而不是阻碍或否定这种秩序的方式来达到这个目的。当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所有这些都是相互关联的；要有效地完成一个目标，而不同时（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完成另一个目标，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除非那些负责诊断、设计策略、推荐行动计划和执行这些计划的人知道他们自己在做什么，否则这些目的根本无法完成。他们不能只是在大致上了解情况，而是应该清楚地知道城市每一个与他们有关的具体地方的情况。他们只能从这里的人那儿了解很多情况，因为没有人比这些人更知道此地的情况。对于这种规划来说，各个方面的管理者只是了解一些具体的服务措施和方法是远远不够的。他们必须要彻底弄明白、搞清楚每个具体地方的情况。只有“超人”能从整体的角度一下子就把城市搞个透彻，而无须从细节上知道怎样才能引导有利的行为，避免不必要的有害行为。

今天，在很多城市规划专家中存在着一种广为传播的信念，即，既然城市问题已经超越了规划者们和管理者们控制和理解的范围，那么，一个更为有效的解决方法便是，把与这些问题有关的城市区域和问题本身在城市范围内“放大”，这样就可以从一个更广泛的方面来对付这些问题。这完全是一种源于思想枯萎的逃跑主义。早就有人尖锐地讽刺说：“我们找不到解决地区问题的方案，就把它们整合成更大的区域，这样就安全多了。”现在的大城市政府其实与小城镇的政府没有多少区别；把后者撑大以对付一些大问题，这样就成了大城市的政府，但是把小政府扩大为大政府却是采用了非常保守的方式。这个过程产生了非常奇怪的后果，最终这些后果变成了非常有害的因素，因为从根本上说，大城市面临的城市问题与小城市的有着本质区别。当然，有很多地方是相似的。正如任何一个居住地一样，一个大城市也有需要管理的区域，各种各样的管理和服务形式需要在这些区域里进行。和大部分小居住地一样，从逻辑和实际情况出发，大城市也需要有组织这些管理形式的垂直方式：也就是说，每一个管理方面都有一个组织形式，如，城市范围的公园管理部门、住宅部门、交通部门、医院部门、水供应部门、街道管理部门、牌照管理部门、警察部门、公共卫生部门等诸如此类的部门。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的部门会加入这个行列——防止污染部门、重新开发署和公共交通管理局等等。但是，因为这些部门机构需要面对大量的工作，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即使是最传统的部门也会



在内部产生很多分支。很多这样的分支本身就是呈垂直状：各个机构在内部按照责任不同分成不同部门，每个部门同时负责整个城市范围内的那部分工作。比如，公园管理机构会分出以下几个不同的部门：林业部门、维修部门、休憩地设计部门、娱乐项目部门等，这些部门都受公园管理机构管辖。住宅管理机构也有不同的分支，如地址选择和设计部门、维修部门、社会福利部门、租户选择部门等，每一个分支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机构。其他一些机构，如教育委员会、福利机构和规划委员会等也是同样的组织。除了这种按照责任不同设置的垂直性分支以外，很多管理机构还有横向性分支：这些分支按照不同的地域划分，用来搜集信息或者是完成布置的任务，或者两者兼有。比如，警察分管片区，卫生健康片区，福利片区，管理分支学校和公园片区等等。在纽约，五个行政区的区长办公室只有对几个部门有完全管辖权，即街道部门（不包括交通）和几个工程部门。这些内部分支，不管是垂直性还是横向性，就其本身（不与别的部门发生关系，处于一种封闭的状态）来说都是合理的。但是，从一个大城市的角度来看，把这些部门放在一起就会呈现出混乱状态。但如果是一个小城市，情况就会是完全不同，不管其内部分支是什么形式的。比如像纽黑文这样拥有 16.5 万人口的小城，一个管理机构的领导和他的属下很容易进行交流，而且也可以和别的部门进行完全的合作，如果他们原意这么做的话（他们是否有很好的思想需要交流，则另当别论）。更加重要的是，在这样的一个小城市里，机构的领导和工作人员可以同时成为?个方面的专家：他们可以是其负责领域里的专家，同时也可以是关于纽黑文城市本身的专家。一个管理者（或者是任何一个人）要想清楚地了解和理解一个地方，唯一的方式是首先要在一段时间里掌握第一手信息和进行实际观察，其次更多的时候是要从了解这个地方的人——可以是政府部门的也可以是政府部门外面的——那里了解这里的情况。有些信息可以用图勾画出来，或者是用表格来表示，有些则不能用这种方式来表示。任何一个稍稍有点聪明才智的人都可以通过这几种方式的结合来知晓纽黑文。不管是聪明人还是笨人，要想细致地了解一个地方只有通过这种方式，别无他法。简而言之，从行政结构来看，相对来说，纽黑文拥有一个比较协调一致的管理机构。像纽黑文这样一个能够拥有互相协调的管理机构的城市，很多人，尤其是管理者都不以为然。当然，也许还会有其他提高管理效率和方式的路子。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没有人会愿意打着这个招牌把纽黑文改造成如下模样：公园管理部门的八分之一，卫生健康片管区的六分之一，福利片管区的三分之一，规划人员的十三分之一，第一学区的一半，第二学区的三分之一，第三学区的九分之二，2.5 个警察部门，最后剩下的是交通局长匆匆经过时留下的困惑的眼神。

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只有 16.5 万的人口，任何一个部门负责人都不再会从城市整体的角度来看待纽黑文。有些人看见的只是某个部门的管辖范围，另一些人看见的虽然是整个城市，但只是一个表面现象，本质上还是将其当成一个大部门下的小单位。在这样一种情形下，要想进行有成效的管理工作包括规划当然就变得不太可能。可是，这就是我们在大城市试图进行的搜集信息，提供服务和进行规划等工作的方式。自然，这样做的一个结果是，一方面每一个人都想解决问题，而且也应该能找到解决的方法，但另一方面这些问题又都超出他们的理解和把握之外。想象一下把上述假设的纽黑文情形扩大成 10 倍或者是 50 倍，即这种情况出现在人口从 150 万到 800 万不等的城市里（我们不能忽视的是，人口的增加不仅仅是一个算术问题，而且也是一个地理情况的变化问题），这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对每一个城市区域的混乱状况进行归类划分，然后再汇总到城市巨大的官僚部门机构。在这个由牵涉到各个方面的部门组成的庞大官僚帝国内部，各种数不尽、点不清的合作、协调、会议和联络把这些部门联系在一起，但这种关系本身是很脆弱的。这种关系之复杂就像迷津一样，即使用图也很难表示出来。这些部门本应起到沟通部门间的互相理解、或者是分享一些个别地方的信息以及将一些工作完成的作用，可是，正因为这种复杂但脆弱的关系，这样的作用能不能让人信赖很值得怀疑。无论是市民还是官员本身都会在这种迷津般的关系里无穷无尽地兜圈子，抱着希望来，带着绝望走。在巴尔的摩就有这么一个例子。有一个市民组织申请做一件事情，这个市民组织有内部关系，申请的程序也没有什么错的地方，但即使这样关于这个事情进行的会议、协调及转关系和批复等还是花费了一年的时间——而付出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仅仅是要获得同意把一座熊雕像搁在一个街道公园里。本来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在这种迷宫般的体系里，变得极其复杂。而稍稍复杂的事情则更不可能办到。我们可以来看一看《纽约时报》1960 年 8 月对一场火灾的报道，这场火灾烧伤了一处出租房里的六个人，这处房子的所有者是市政府。报道说，“在 2 月份消防部门给住房部门的一份报告中就指出这处住房有火灾隐患。”但住房部门的头头申辩说，他们的住房巡查员一直都在试图进入那处住宅房，包括 5 月 16 日（市政府在这个日子拥有了那处房子的所有权）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报道这样写道：这位头头说，事实上，房产部门（拥有那处房子的市政府机构）直到 7 月 1 日才告诉住房部门，它们已拥有了那处房子的产权。

但是，一直要到 25 天后，这个通知书才完成了它的旅程：从市政府大楼住房部所在的 20 层到位于 18 层的（住房部的）住房处。当住房处在 7 月 25 日得知这个消息后，他们打电话到房产部询问巡查途径事宜。住房部头头说，房产部最初告诉说他们没有那处住房的钥匙。于

是，开始协调……当火灾在 8 月 13 日星期六发生时，协调还在进行。一位不知有火灾发生的住房部官员在星期一的时候还在继续为这件事情进行协调……如果说这种完全属于内部交流的情况已经让人感到过于繁琐、冗长和无效，以致理不清头绪的话，那么可以设想要同这种情况进行交涉会是什么情形。很多人满怀希望、信心十足地来到这个官僚帝国里，但最后都会不约而同地放弃他们的努力，只是为了给自己省点力气。如果政府部门之间的信息交流和有效合作这么困难，那么可以想象那些必须要从外部同他们打交道的人遇到的困难和挫折会有多大。有时候，人们组织一些集体行为向一些民选官员施压，尽管难度很大，时间消耗很多，而且还要付出很多费用，但是一些大城市的市民们知道这是唯一可以帮助他们绕过非民选官僚系统的方法。相比之下，与后者打交道难度更大，消耗的时间更多。[2]

对于一个自治社会来说，为了消除各种利益之间的争斗，使用一些政治行为和压力总是必要的，也是合理的。但是在一个大城市里——就像现在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就是另一回事了。通常，在大城市里，花费大量的精力——常常达不到效果——仅仅把一些与一件事情有关的各个部门的专家凑到一块。而且，更加荒唐的是这种“联络安排”——纽约规划委员会对此这么称呼——的结果是聚集在一起的专家都是对此事本身一无所知的人！在你试图与这种分门别类部门里的某位专家打交道前，你永远也不会意识到牵涉到一个大城市里街区的情况会如此复杂。这就像是用你的嘴去拱破一个枕头。大城市的市民总是受到这样的指责，即对政府缺乏足够的兴趣。这种指责当然非常奇怪，因为实际上市民一直在努力对政府感兴趣。在其登载在《纽约时报》上的关于少年犯罪的系列文章中，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指出，之所以这种情况（少年犯罪）没有明显的改善，一个重要的障碍来自互不连贯的信息、互相扯皮的管理机构、互相推诿的过程和失去威信的行政当局。“真正乱成一团的地方是那些官僚者办公室。”他援引一个研究少年犯罪的学者的话说。索尔兹伯里自己概括说：“一个互相冲突，互相重叠，混淆不清的管理机构就是我们今天拥有的社会法则。”现在，很多人甚至都认为办事没有效率、拖沓的情况是一种故意行为，或者至少是来自管理机构本身混乱状况的一个必然结果。“矫饰主义”、“官场妒忌”、“只顾现实利益”、“冷酷无情”等词语经常能从那些在这个官僚帝国体系里遭遇挫折而愤懑绝望的人那里听到。毫无疑问，这些词语描述的情况的确存在——部门这么多，完成的事情却如此之少，不出现这样的情况才怪——但是，另一方面，这种状况决不是个人造成的，或者是某个人因为歹毒而有意为之的。这是体制的问题，而这样的体制即使是神仙也很难扭转局面。管理体系本身出了问题。管理机构是为了适应现实的需要而设置的，但现在它超越了这种需要，自己成了被管理的对象。这正是我们的社会遇到的一个悖论。在这



种复杂的局面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就会需要一个新的机构来做这种“管理的管理”的工作。很多城市在这方面花了很大精力对付互不关联的管理体系的问题——规划委员会的产生就是一个结果。按照城市管理的理论，规划委员会是宏观的管理协调者。作为美国城市政府体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规划委员会的历史还很短，它们中的大多数只是在近 25 年里才成为政府的一个部门。一个显然的原因是希望这种规划委员会来协调城市管理部门应付不了的城市的实际变化。但是，这个新发明并不很好，因为它本身重复了，而且在很多情况下加剧了它原本要解决的问题。就像和官僚帝国里别的部门一样，规划委员会在本质上也是按照垂直形式体系来组织的，即，按照不同的责任分成不同的部门；然后，根据需要，又会按照横向形式分出不同的处和科，这个方面一个处，那个方面一个科，完全是随意增设（如重建管区、保护地区，等等）。在这样一个设置的情况下，就像和别的部门那种分裂体系一样，即使在以协调为目的的规划委员会里，也没有一个人能真正弄明白城市某个地方到底是什么情况。更有甚者，作为城市其他机构提出的具体计划的协调者，规划委员会负责协调的建议都是那些机构的官员们至少已经考虑好了准备怎么做的计划。这种建议从各个方面汇集到规划委员会，委员会然后依据自己掌握的信息和观念来确认这些建议是不是有理由成立。但是，协调这些建议的黄金时间应该是在这些建议形成之前，或者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间，也就是说在关于任何一个具体地点的具体措施策略还没有形成之前的时间。自然，在这种与现实脱节的情况下，协调者根本无法进行协调，他们本身之间就很难协调，更不用说为别的机构协调了。费城的规划委员会被广泛称赞为这个国家里最好的一个规划委员会，从各种方面来说，也许确实如此。但是，当有人试图弄明白为什么这个规划委员会最珍爱的美妙构想，格林卫绿色“林阴道”[3]在实际情况里没有表现出规划者的设计蓝图时，规划委员会的主任自己解释说，街道管理部门没有弄懂他们的意思（等等），而且也没有给他们提供相应的人行道区域；同样，公园部门、住宅管理部门以及那些开发商们也都没有弄清楚他们的意思（等等），这些部门对空间的处理与他们原来的构想很不一样；此外，那些与街道上的设施有关系的城市部门也没有弄清楚他们的意思——总之，城市里的市民没有能理解他们的意思，等等等等。

这位主任显然是想告诉人们，规划委员会要想让他们的想法得到别的部门的理解真是比登天还难，因为这里牵涉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太复杂了；对他们（规划委员会）来说，检查其他部门的建议，然后再加入自己的想法，这样做还不如完全由自己进行规划来得更有意义。但是，不管怎样这还只是一些小问题，相比之下，在进行另外一些方面的规划协调时，则更是困难重重，如，非贫民区化，安全问题，城市视觉秩序的展现，经济环境的改善以获得更多的多



样性等等。在某些情况下，规划委员会非但没有成为理解和协调城市复杂的各种具体细节的有效手段，反而本身成为了阻碍这种有效手段发挥的“手段”，成为了城市“建设停滞”和实施简单化、一刀切的手段。而且似乎这是一种必然的过程。规划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不能也不可能了解城市各个地方的具体情况，更不用说能做点什么。即便是他们能从花园城市——辐射——城市美化这种规划思想意识转到城市规划思想意识上来，他们也不可能在城市规划上真正做点什么。要想在城市规划上真正做点什么，一个条件是需要各个方面的细节，但他们并不具备得到或者是理解这些细节的手段，部分原因是因为规划委员会本身这个机构就不适合大城市的状况，还有部分原因是因为别的部门存在着同样原因。我们可以看到在城市里进行的信息与行为之间的协调间存在着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而且也是这个问题的症结所在：最主要的协调归根到底是在一个具体地方的各个服务体系之间的协调。这既是最需要的也是最困难的。相对来说，各个垂直部门内部的协调要简单一点，而且也不涉及至关重要的地方，这是由这种管理机构本身所决定的；但是，除此以外的协调就会非常困难，而关于具体地方的协调则更是不太可能。从思想意识上来说，城市管理理论根本就没有认识到这种涉及到具体地方的协调的重要性。这里的原因还是主要在于规划委员会本身。

规划者往往认为处理的都是城市整体规划的事项，他们描绘的都是城市的“整体图景”。但是这种以为其任务是高高在上用鸟瞰的方式规划城市的思想本身就是一种幻觉。除了主干公路规划（这本身就做得非常糟糕，原因之一就是没有人知道公路涉及到的当地的情况）以及预算中纯粹是规范化的房屋修缮规划支出方面以外，城市规划委员会以及其工作人员的工作实际上很少是从城市整体方面来进行规划工作的。从其工作的本质来看，几乎所有的城市规划工作都涉及到具体的、小范围的行为，涉及到具体的街道、街区和地区。要弄清楚每一行为的结果是什么，好还是不好——或者是到底该做还是不做——重要的是弄清楚规划行为进行的具体地方的情况，而不是这样的行为有多少可以在别的地方进行，怎样进行（这当然也是重要的，但应分清主次）。在进行规划行为时，任何规划方面的专业知识都不可以取代对具体地方的了解，无论这种规划是多么创新、多么有前瞻性或者协调一致。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一个高高在上进行协调的组织机构，而是一个能够在需要的地方——具体的、个别的地方——进行协调的规划单位。当然，大城市需要划分成几个行政地区。这些行政地区应该是城市政府底下的横向性权力机构，它们的地位是一样的。这些行政地区应该能够包含大多数城市机构中的分支机构的功能。一个机构中的主要官员（最高官员下面的官员）应该成为行政地区的行政官员。一个地区的行政官应该负责监管在其地区内的所有行政服务部门的各个方面；在其属下的工作人员

则应能够将他的服务传送到每个具体地点。每一部门则应直接对该地区提供各个方面的服务——如，交通、福利、学校、警察、卫生、住宅资助、消防、划分和规划等。每个地区行政官有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要负责地区的工作，另一方面要负责他自己所在机构的工作。这样的两个方面的工作对任何一个有点聪明才智的人来说并不是不能驾驭——更何况在这些行政地区里有很多人（男女皆有）会从其他角度看待他面对的同一个问题，他们不仅理解这个地区而且还会为这里的工作尽心尽力。这些行政地区应该直接与现实打交道，而不是组建一个新的组织，然后再在这个组织下分出各个管片去对付现实情况（这样的一个结果就是分离支解现实）。这些行政地区现在应该——而且也有这个潜能——作为一个社会和政治实体来运转，就像在第五章里已经描述过的那样。有了这样一种政府行为的框架，我们可以期待城市范围内的一些公共服务的自愿组织也采纳这样的组织框架进行运作。这种横向性城市行政机构并不是新事物。其实，城市行政管理很多时候早已经使用了这种方法，只是所设置的横向机构随意性比较强，而且存在着协调不好的情况。在城市重建地区和保护地区的设定——现在这种情况已经非常普遍——方面也有这样的先例。当纽约开始试图在小部分区域实施街道保护计划时，这个项目的主管很快就发现他们很难有什么进展，除非他们能够与一些部门进行特别的协调和安排；这些部门包括：住宅部门、消防部门、警察部门、卫生部门以及公共环境卫生部门，后者专门要为这些地方提供公共环境卫生的职员。这只是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但是说明即使要获得哪怕是一丁点的成果也需要进行这样的协调。纽约市政府把这种步调一致的协调和安排描述为是一个“专门为街区开设的提供服务的百货商店”，无论是市政府本身还是有关的市民都把这个结果看成是这个被宣布为保护区的街区得到的主要好处之一。在那种横向性行政机构的先例中，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大城市里的街区服务中心，这些为城市公共住宅居民提供服务的组织常常把一个区域作为他们活动的主要地方，而不是单独地在很多区域进行活动。这也是为什么这个组织这么有效率、为什么它们的工作人员了解这里就像了解自己的工作一样清楚、为什么它们的服务既没有过时，也没有互相冲突的主要原因。一个大城市的不同的街区服务中心一般都能在很大程度上协调一致进行活动——资金募集、寻找专门人员、思想交流、向立法机构施压——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的作用甚至超过了横向性机构；实际上，既是横向性的也是垂直性的，也就是说这样的组织结构使得协调能够顺利进行。对于美国城市来说，行政地区这种思想也不是一个新出现的概念。在过去的时间里，一些市民组织曾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过这个建议——在纽约，市民联盟这个颇有能力，且经验丰富的组织曾在 1947 年提出过这个建议；这个组织甚至还在现有的城市自然地区格局基础上构划出一个非常实用的城市行政地区图。一直到今天，这个城市行政图仍是关于纽约城最有逻辑、最好理解的地图。但是，通常，一些关于大城市地区

行政管理的建议仅仅是没有实际意义的想象而已；我认为这也是为什么这些建议会变得不着边际的一个原因。比如，有些时候，这些想象被设想为是提供给政府的有着具体形式的“建议”。但是，在实际生活里，一个没有权利，也没有任何责任的建议团体在地区行政管理方面根本提不出什么有用的建议。他们不仅浪费大家的时间，而且在阻止那种迷津般官僚体系延伸方面也不见得特别高明。或者，有些时候，行政地区也会被设想为只承担一种“主要”服务，比如规划，但即使这样，它还是解决不了什么重大问题，因为作为一种政府管理的手段，要想发挥出用处，行政地区需要把政府活动的各个方面都包括在内。有时候，行政地区的目的被设想为只是在当地建立一些“市政中心”，也就是说只是给城市增加一些装点门面的项目而已。地区行政管理的办公间应该位于这个地区内，而且还应该相互靠得很近。但是，这样的安排并不是指要非常显眼，或者建筑物形象要突出。从外来办事的人的角度说，地区行政管理最重要的是不用经过“联络安排”就能够与管理者进行有效的交流。作为城市政府结构的一种形式，地区行政管理从本质上要比我们现在建立在小城镇的行政结构的形式复杂得多。城市行政管理在基础面上需要更加复杂，这样就能更加有效地发挥作用。现在的情况刚好颠倒：基础结构过于简单。有一点我们必须理解，大城市的地区行政管理不可能是“纯粹”或教条主义的横向性管理，它们之间的纵向联系不能被忽略。一个城市再怎么大，仍然是一个城市，不同地区，不同部分间有着无数的互依互存的关系。不是说把几个小城镇集中到一块就变成了一个城市；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个城市也就肯定有被毁灭的一天。教条主义式地把一个政府形式重组为“纯粹”的横向性管理结构，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仅是太简单化，而且还完全违反现实，导致混乱，就像现在的情况一样。比如，如果只是为了课税和资金的整体分配，就要把城市的各个功能集中化，这样做实在太不切实际。更不用说，城市的有些运转方式是完全超越地区行政管理结构的；对于这些运转形式来说，它们不需要了解太多、太详细的关于这个地区的情况，如果有些情况需要了解，那也很容易从了解这个地区的管理者那儿得到这些情况。水供应、空气污染控制、劳工调解、博物馆、动物园和监狱管理就属于这样一些例子。即使是在一些同样的部门里，有些服务项目是与地区无关的，而有些则是相关的；比如，如果一个执照管理部门把颁发出租车执照看成是地区行政职责，那就是愚蠢的，但是，二手车经营者、娱乐场所、小贩、钥匙配制者、职业介绍所以及很多其他的形式等，对于这些行业的执照颁发就应该是地区的行政职责。此外，城市还可以向地区提供一些专业人员，这些人员会对地区非常有用，尽管地区并不总是需要这些人员。这些人员可以充当某个部门的巡回技术专家，哪儿需要就把他们派向哪儿。一个实行地区行政管理的城市应该尽量使城市的每一个服务分化到地区层次，使得城市提供的服务与这种新的行政组织形式挂起钩来。但是，对某些服务形式，或者是某些服务中的

某些部分来说，需要先看一看能不能行得通，然后才能这样做。很多时候，需要做出各种各样的调整。要实行这样一个体制并不需要先制定出一套运转方式，然后一步不差地按照这种方式进行。事实上，要让这种体制行之有效需要的不是给予权利，而是随时做出调整。要让这种新的体制行之有效需要的是一位对平民政府有着坚定信念的坚强的市长（往往这两者是不可分割的）。简而言之，城市范围的垂直服务部门仍将存在，这些部门可以把信息和思想从各个地区集中到一起。但是，不管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各个服务部门的内部组织结构应该合理化，做到互相匹配，不仅是在各个部门间消除理解鸿沟，而且在与某个具体地方打交道时也能如此。在规划方面，城市层次的规划部门还是应该存在，但是其大部分工作人员应该以非集中的方式服务于城市，也就是说服务于行政地区，只有在这个层面上，目的是城市活力的规划才能得到完整的理解、协调和贯彻。

大城市的行政地区还会很快就开始成为一个政治实体，因为这些地区将会拥有真正的集中信息、做出决定和采取行动的机构。这将会成为这种体系的主要好处之一。大城市的市民需要一个他们可以施加影响、表达意愿、获得别人的了解和尊重的地方。行政地区不可避免地要求这么一个地方，这么一个支点。很多今天在一些政府垂直部门发生的冲突——或者是一些悬而未决的决定，因为市民不知道这些决定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都可以转到这些行政地区的层面上。这对于大城市的自治和自我管理是必需的，不管这种自治是一种自我中心还是监督过程（当然两者都有）。大城市政府变得越大、越不具人格、越不可理喻，原本完全是属于本地应解决的事宜、需求和问题就会变得越加非地方化，而与此同时，市民也就越会变得漠不关心，市民的监督也就越会变得无效。如果在很多涉及本地事宜问题上，市民没有自治权利——这常常是对市民最有影响的一个因素，那么很难想象市民会在涉及城市范围内的事情上承担责任和表现出热情。作为一个政治实体，行政地区应该需要一个首脑，可以通过正式手段，也可以通过非正式手段来得到这样一个首脑。正式的手段可以通过任命委派的方式——这是最简便的方式，即，委派一个副市长，管理某个行政地区，这个人向市长负责。但是，与民选官员相比，这种通过任命委派的官员常常存在着很多劣势，一个简单的原因是只要有可能，市民组织就会经常向官员施压——而且也会坚决支持这个官员，如果他能让市民们的意见得到体现的话——市民们的一个目的是要让这些官员按照他们的意见行事。选民们常常是一些很有头脑的人，如果发现能够很容易向什么人施加影响，他们就会向这个人靠拢，把他当成可以解决问题的钥匙。因此，很多时候，一个自然而然的现象是，一些在一个与地区差不多大小的选区里选出来的民选官员会成为实际上的“区长”。现在，哪个大城市的地区在社会和政治方面运转有

效，那个地区就肯定拥有这样的民选“区长”。①①在这个意义上，“区长”的形成包含两个方面：选民是否能很容易找到他，他是否能成功地体现选民的要求，另一个则是他所在的选区的大小。从第一个因素看，如果他的行为不一样，那情况就会不同。但第二个因素同样也很重要。因此，尽管在很多城市里，市议员比较容易成为地区“区长”，但是纽约的情况就不同。在这个城市里，市议员的选区太多（大约含 30 万选民），这么大的选区不适宜成为一个地区。相反，地区“区长”常常是由一些州议员担任，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的选区相对来说要小得多（含 11.5 万选民），因此也就常常被用来处理城市政府方面的事宜。纽约城里的一些优秀州议员代表市民处理的城市政府问题要比他们处理的州政府问题多得多。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充当了至关重要的城市官员的角色，尽管从理论上说这原本不是他们的工作。这实际上是地区政治不得已采用的权宜之计的结果。

一个行政地区究竟应该有多大？从地理情况上说，有些城市自然地区充当了行政地区而且运转非常有效，这些城市自然地区一般都不会超过 1.5 平方英里，而且很多时候比这还要小。但是，有一个地方特别例外，而且正因为其特殊之处而为别的地方提供了重要借鉴意义。这个地方就是芝加哥的“后院”地区，这个地方差不多有上面提到的运转有效地区的两倍之大。实际上，“后院”早已经在实行行政地区的运转方式了，不是形式上或者理论上，而是事实上如此。在这个地方，“地方政府”确实在负责，但是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政府，而是“后院”理事会，我在本书第十五章里简单地提到过这个理事会。这个理事会做出了一些只有强有力的政府才能做出的决定，并通过它传送到市政府；我们可以说这是非常有效率和针对性的管理方式。此外，这个理事会本身还提供了一些服务，这些服务一般来说正是政府应该提供的。也许正是因为“后院”起到的这种虽不是正式的，但却是真正意义上的政府权力的职能，才使其有可能拥有这么一个超大型地区。简单来说，对一个地区的强烈认同——其基础常常是本地区内的交叉使用，非常有利于这个地方的政府活动。对于大城市的一些地方来说，这样的认同有着重要意义；在那些地方，住宅是主要用途之一，但是那儿的住宅密度太低，很难形成一个地区所需要的足够多的人口。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地方应该逐渐向着城市集中用途的目标靠拢，最后这样一个地方会形成好几个地区。但目前来说，如果“后院”能够起到我在前面描述的地区作用，那么这些地域宽广、人口稀疏的地区在引进了行政地区管理体制后也有可能在社会、政治以及行政管理方面和“后院”地区一样运转良好。在闹市区外面，或者是一些大型工业区外围，住宅区总是一个城市地区的主要用途之一；人口的多少因此是衡量一个地区的大小的重要指标。在第五章里，在谈到城市的街区时，我们把一个自然形成的地区界定为这样：它应该

足够大（在人口方面），以致在整个城市里有说话的分量，但同时也应该足够小，以保证街区不被忽视。按照这么一种概念，在如波士顿和巴尔的摩这样的城市里，地区的人口应该最少为 3 万，在一些大城市里，则应在最小为 10 万和最多为大约 20 万之间。我认为，从地区行政管理的有效性来说，3 万有点过低，50,000 应该是一个比较现实的数字。最多为 20 万人的地方也可以成为一个行政地区，但这主要是从作为一个社会和政治实体的角度来讲的，因为大于一个单位的事物，可以既从宏观又从微观上来理解它。就其本身来说，大城市已经成为更大区域里的一个城市居住部分，这个更大区域叫做标准大都会区域。一个标准大都会区域包括一个主要城市（有时候多于一个，比如纽约—纽瓦克，或者是旧金山—奥克兰大都会区域），同时还有相关的城镇，小卫星城市，以及村庄和郊区，这些都位于主要城市的外面，也就是说与后者不在同一个政治区域，但在同一个经济和社会区域内。在过去的 15 年里，无论在地域方面，还是在人口方面，标准大都会都已经得到了迅猛扩张。一个原因是因为急剧性资金涌入城市边缘地区和缺少资金地区，就像在第十五章里描述的那样，另一个原因是因为大城市在城市内部发展的失败，再一个原因则是因为前两个原因导致产生的郊区和半郊区吞噬了原有的那些村子和小城镇。很多问题，尤其是规划问题，对这些有着不同城市政府的大都会区域来说是同样的问题。特别是在涉及解决水污染问题，或者是重大的交通运输问题，或重大的土地浪费和滥用，以及涉及地下水位、荒地、大型娱乐场所和其他资源的保护方面。因为有这些现实和重要的问题的存在，因为从行政的角度来说，我们没有一个解决这些问题的好的方案，于是就有一个叫做“大都会政府”的概念出现。在大都会政府之下，那些政治上独立的地方可以在关照自己本地利益的同时共享一种同一的政治身份；它们可以组织成一个联邦，上面是一个超地区的政府，这个政府享有广泛的规划权和行政权，用这种权利可以将计划变成行动。来自每个地方的税收的一部分应该进入到大都会政府，这样可以帮助一些大城市卸去一些财政负担，因为城市的一些主要设施往往被郊区使用，但经费并没有得到补偿。政治上的区域界限往往会成为这种共同规划和对大都会共同设施的支持的障碍，有了这样一个政府后，这种障碍也就可以迎刃而解。

大都会政府这种概念不仅受到很多规划者的欢迎，而且还似乎得到很多大企业家的青睐；这些人在很多讲话中都把这看成是解决“政府问题”的合理方式。但是，大都会政府有充分的事实说明在目前这种状况下，大都会区域的规划根本无法进行。这个事实是基于目前的大都会政治格局地形图而提出的。靠近这个图的中心地带是一块突出、显眼的区域，代表整个地图中最大的城市，即大都市。在其外面是一片毫无规律和秩序可言的城镇、县、小城市和小城镇的

政府，以及各种形式的、因为权宜之计而设置的特殊行政区，所有这些地方互相重叠、互相渗透、互相重复，有些甚至与大城市有交叠的地方。比如，在芝加哥大都会区域，除了芝加哥市政府以外，还有大约 1000 个交邻、交叠的地方政府单位。在 1957 年，美国 174 个大都会区域拥有 16210 个不同的政府单位。“政府是大杂烩”，这句流行语是对这种现象的一个很好的形容，从很多方面来说，也是一个贴切的描述。从中得出的一个教益是这样的：“大杂烩”政府不可能理性地发挥政府功能；对大都会规划和行动来说，这样的政府提供不了可行性条件。在大都会区域，“大都会政府”经常会作为一个提案交给选民表决。但是，选民总是加以否决，根本没有商量余地。[4]

选民们当然有他们自己的理由，虽然在很多大都会区域的问题上，存在着共同行动和协调一致的需要（包括金融方面的支持），但是更加需要的是这个区域内的各个地方政府间这种那种的协调。选民们的理由是充分的，因为在实际生活里，我们缺少使一个大规模的都市政府运转良好的策略和方法，这也包括大都会范围的规划行为。那种似乎可以解释目前的情形的说明图其实包含了很多极其有害的虚构成分。这个图里中间那个整齐、清洁、完整的地方代表了都市政府；但是，这本身就是一个“大杂烩”政府，其“杂”的程度要远比那些在其外围的凌乱的地方政府要厉害得多。这个“庞大”其实就是意味着地方上的无奈状态、缺少人性、简单化的规划和行政管理方面的混乱——这就是目前所谓“庞大”的实际情况，在这样一个时候，选民们拒绝进入这种“庞大”的体系是完全有道理的，也是明智的。那些造成“征服”结果的规划行为能说要比没有规划更进步吗？

那些谁也弄不明白的、谁也找不准方向的迷津般的庞大行政管理机构就一定会比郊外地区的“大杂烩”地方政府要好吗？我们早已经看到，有些政府单位在呼吁新的、可行的有关大都会政府的策略和方案（包括规划方面）的出笼。进行这些呼吁的本身就是一些大城市。符合实际的可行的大都会政府应该首先在大城市里试验，在那里不存在会对此造成阻碍的区域政治界限问题。在大城市我们可以找到解决共同问题的方法，而同时又不会对城市地区以及地方自治过程造成不必要的混乱。如果大城市能够像一个规模适合的行政地区那样学会如何处理行政、协调和规划事宜，那么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说，我们就会有能力来对付大都会区域内的“大杂烩”政府和管理问题。但是，目前我们还不具备这个能力。除了经常不断地、不完全地照搬一些小城市政府的形式外，我们在处理大都市行政管理或者是规划方面还缺乏实际经验或者是智慧。

注释：

[1]斯坦利•M.艾萨克斯，纽约城市议会议员，曼哈顿区前区长，在写给《纽约时报》关于修正听证会议程的信中这么说道：他们还会举行听证会吗？当然会。但是，我们这些有经验的人知道这种听证会表示什么。从表面上看，这种听证会与平常的没有什么区别。但实际上，在这之前，他们会先召开一个执行会议（时间是在星期三，比公开听证会早一天）。所有的事情都会在这个会上做出决定，然后在公开听证会上，公众的意见会得到很有礼貌的倾听，当然只是左耳进，右耳出。”

[2]一些利益集团有时候会雇用一些“有影响的人”来克服一些对其利益有妨碍的困难，就像与普通市民组织起来通过一些民选官员向官僚部门施加影响一样。纽约城市重建方面的一个丑闻就涉及到向悉尼•B.巴伦（民主党领袖卡米伦•G.德萨皮奥新闻发言人）献金一事，有六个联邦政府资助的重建项目赞助了巴伦。根据《纽约邮报》报道，其中一个赞助者解释说，“老实告诉你，我们雇用巴伦不为别的，就是因为他有影响。我们要等上几个月才能见到那些局长们——比如，卫生、消防和警察部门——但是他要做的只是拿起电话，立马我们这边就会见效。”这则报道继续说，“巴伦非常坚决地否认他是主要被用来‘与城市机构打交道’的，他说：我只和他们见了两次面，一次是和卫生部门，另一次是消防部门。’”

[3]当然，“林阴道”上是没有行人的。

[4]唯一一个例外是来自迈阿密大都会的选民。但是，为了让那里的选民接受大都会政府这个主意，这个提议的支持者给这个政府的权利非常有限，结果只不过是一个形式而已。

（简·雅各布斯，记者，《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作者。本文节选自《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原文链接：https://cochina.org/?p=6519 ）

【返回目录】

【范】

8-8 E.B.怀特：这就是纽约



“大体说来，有三个纽约。一个属于土生土长的男男女女，他们眼中，纽约从来如此，它的规模，它的喧嚣都是天生的，避也避不开。一个属于通勤者，他们像成群涌入的蝗虫，白天吞噬它，晚上又吐出来。一个属于生在他乡，到此来寻求什么的人。在这三个动荡的城市中，最伟大者是最后一个——纽约成为终极的目的地，成为一个目标。正是这第三个城市，造就了纽约的敏感，它的诗意，它对艺术的执着，连同它无可比拟的种种辉煌。”

有谁指望孤独或者私密，纽约将赐予他这类古怪的奖赏。正因其大度，城市的高墙里面，才容纳了众多这一类人；纽约的居民都是些外来客，离乡背井，进入城市，寻求庇护，寻求施展，或寻求一些可大可小的目标。纽约的一个神秘特点就是有本事派发这类暧昧的礼品。它可以摧毁一个人，也可以成全他，很大程度上就看运气。除非愿意碰碰运气，否则，不来纽约最好。纽约是艺术、商业、体育、宗教、娱乐和金融荟萃之地，在这么一个浓缩的竞技场上，挤满了角斗士、布道者、企业家、演员、证券商和买卖人。它的西服翻领上浸润的味道，年深日久，洗也洗不掉，结果，不论你身在纽约何处，都免不了与伟大时代、辉煌事功、奇人、奇事、奇闻发生感应。此刻，我坐在中城闷热的旅馆房间里——房间紧靠高楼天井的半截腰处，忍受华氏九十度的高温。房间里没有一丝风，然而，我仍不由地感受到周遭有什么东西扑面而来。隔二十二个街区，是鲁道夫·瓦伦蒂诺的遗体安葬处；隔八个街区，内森·黑尔给人处决；隔五个街区，欧内斯特·海明威在出版商的办公室直捣马克斯·伊斯曼的鼻梁；隔四英里，沃尔特·惠特曼坐在桌前，埋头为《布鲁克林鹰报》写评论；隔三十四个街区的一条街上，薇拉·凯瑟住过，她来纽约，写一些关于内布拉斯加州的书；隔一个街区，马塞林曾经在竞技场剧院的

舞台上插科打诨；三十六个街区外一处地方，历史学家乔·古尔德当了众人的面，将一台收音机踢得粉碎；隔三十个街区，哈里·索枪杀了斯坦福·怀特；隔五个街区，我曾经在大都会歌剧院为人引座；仅隔一百零二个街区，老克拉伦斯·戴在主显教堂洗去了他的罪恶，（这份单子，我可以没完没了地续下去。）如此说来，我现在栖身的这个房间，很可能住过不知多少不朽的名流，他们中的一些，也是暑天坐在这里，热得喘不上气，孤独而又闭塞，感受着外界有什么东西扑面而来。几分钟前，我下楼用午餐时，瞥见弗雷德·斯通坐在我旁边。（靠墙隔了大约十八英寸）十八英寸是纽约为其居民定下的一个分寸，彼此之间，有联系，又保持距离。我与弗雷德·斯通的联系，只在本世纪初，我看过他演的《绿野仙踪》。但我们的侍应生见到仙境来客，一样也很激动，斯通先生离开餐厅后，侍应生告诉我，他（侍应生）刚来美国时，年纪轻轻，一句英文不懂，头一次约女孩儿看戏，就是《绿野仙踪》。侍应生回忆，演得真是好极了，有稻草人，有铁皮人。精彩！（我俩之间，也是十八英寸。）“斯通先生胃口真好，”他深沉地说，很满意似乎参与了历史，与仙境扯上些关系。

纽约给人参与的快感，又搭赠了私密，与大多数拥挤的社区相比，它成功地将人们隔绝开来，（只要你有此愿望，而几乎每个人都愿意并需要这种隔绝。）免得他们因为随时可能发生的轰动、暴烈或妙不可言的事件受到打扰。就我在这空气污浊的天井旁小坐的这会儿工夫，城里出了不少热闹。一名男子因妒生狂，枪杀了他的妻子。没人大惊小怪，除了他那个街区，报纸也三言两语带过。我亦不去理会。我来纽约后，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航空展也搬来纽约。我没去看，这里的八百万居民，大多数也没去看，虽然据说现场人满为患。我甚至不曾听见飞机的噪音，只有几架西去的商业航班，惯常从大楼天井上空飞过。北大西洋上的远洋巨轮来而复去。我从不注意它们，其他纽约人也是如此。我听说，这里是世界上最大的海港，滨水区方圆六百五十英里，这里停泊的船只来自世界各地。但我来后，只留意过一艘小小的单桅帆船，是我前日晚上走过布鲁克林大桥，碰巧见它趁落潮前抢风驶出东河。不过，有一日午夜，我听见玛丽女王号邮轮鸣笛，那声音传述了一整部别离、思念和伤逝的历史。国际狮子会的名流忙于集会。 狮子无影无踪。我的朋友见到一位，对我讲了他的事情。（他跛腿，穿西班牙式短上衣。）在棒球场和赛马场，体育大赛激战正酣，我不看棒球，也不看赛马。州长进城了，我听到警笛呼啸，但也不过如此而已——仍是十八英寸的距离。一块檐板落下，砸死了人。我与这场悲剧毫无干系，而举足轻重的又是这毫厘之差。我说这些，只为表明，纽约的结构奇特，几乎包容了一切，（从东区上千英尺长的邮轮，到西区两万人众的集会。）断不会转嫁到居民头上，如此一来，所有事情的发生，一定程度上都无可无不可，纽约人乐得自行选择他们的热

闹，保全了自己的灵魂。在或大或小的多数都市里，个人往往完全没有选择。他就好比给抛进了狮子会。狮子会压倒一切，躲也躲不开。檐板坠落，就像砸在每一位公民的头顶，城里的每个人都在劫难逃。有时我想，惟一还能惊动纽约人的事情，怕是每年一度的圣帕特里克日游行了，它的渗透力极强——爱尔兰人是一个想不理会都不行的民族，五十万人居住在这里，家里就有自己的警察。人在纽约，却与世隔绝，这个特点，很可能削弱了他们作为个人的存在。或许，融入某个社群才更健康些，在社群中，檐板落下，人人感受冲击，州长过路，你至少能瞧见他的帽子。

在这一点上，我不想替纽约辩护。许多人定居这里，可能只是为了逃避而不是面对现实。但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稀罕的馈赠，我想它对纽约人的创造力产生了积极影响——所谓创造，一定程度上，不过是懂得如何放弃大大小小的诱惑。虽然纽约经常给人孤苦伶仃、遭世人遗弃的感觉，但它从来都不沉闷或呆滞，你始终觉得，只要愿意搬出十个街区，或者少赚五块美元，就能重新焕发活力。许多人，其实精神上不能自主，他们从这座城市的千变万化和种种刺激中汲取营养，守住了自己的精气神儿。在乡下，也有些机会让人突然焕发活力——比如，天气的变化，或邮件带来什么消息。而在纽约，机会是无穷无尽的。我想，许多人来这里，许是因为精力过剩（他们为此离开了家乡的小镇），但也有些人，倒是因为意气消沉，他们发现纽约是个避风港，也没准儿等闲就帮你换了一种活法。大体说来，有三个纽约。一个属于土生土长的男男女女，他们眼中，纽约从来如此，它的规模，它的喧嚣都是天生的，避也避不开。一个属于通勤者，他们像成群涌入的蝗虫，白天吞噬它，晚上又吐出来。一个属于生在他乡，到此来寻求什么的人。在这三个动荡的城市中，最伟大者是最后一个——纽约成为终极的目的地，成为一个目标。正是这第三个城市，造就了纽约的敏感，它的诗意，它对艺术的执着，连同它无可比拟的种种辉煌。通勤者使它如潮涨潮落般生生不息，本地人给它稳定和连续性，移居者才点燃了它的激情。意大利来的农夫，在穷街陋巷开一间小杂货店，密西西比河岸小镇来的姑娘，只为逃避邻人的流言蜚语，中西部玉米地带来的小伙子，提箱里塞一部手稿，心里充满忧伤，无论是谁，都没有区别：每个人都像初恋一样，心情激荡地拥抱纽约，每个人都以探险者的好奇目光打量纽约，每个人发出的光和热都胜过爱迪生联合公司。通勤者是最怪诞的一群了。他居住的郊区没有活力可言，不过是白日终了时供他歇息的地方。一些人住在玛玛隆耐克或小耐克或逖耐克又在曼哈顿上班，除了极少数例外，他们对这座城市的了解，仅限于火车或汽车班次，或者午间的快餐路线。他终日伏案工作，从不曾漫步夕阳下，惊喜地撞见中央公园的贝尔威德城堡，池塘水面，石堡耸立，男孩子在岸边钓鱼，女孩子随意平躺在突起的岩石

上。他决不会在纽约闲逛，突然发现点什么，毕竟，他得忙着赶火车。他将钓丝瞄准曼哈顿的钱夹子，起获点小钱儿，顾不上倾听纽约的呼吸，也不曾清晨随它醒来，夜里又伴它入梦。每个工作日的早晨，都有大约四十万男女，从地铁和隧道涌出，奔入曼哈顿岛。他们中间，很少有人去纽约公共图书馆，度过让人昏昏欲睡的下午，阅览室窗外，栎树飒飒有声，室内更显得寂静，传送图书的升降机（像架老水车）不断把书吐在托盘里。通勤者守在威切斯特，守在泽西家中的炉前，从没有见过包厘街的火炉，那里，冬夜气温降至零下时，大油桶燃起熊熊火焰。他们可能供职于下城的金融区，从没有见过洛克菲勒中心葳蕤的花圃——水仙花、麝香兰、白桦，还有清晨迎着和畅春风飘飞的彩旗。也或许，他们在中城的写字楼工作，一年到头忙得团团转，却从不曾凭临海堤，远眺总督岛。通勤者生前，跑了不知多少里程，但他从来不曾漫游过。他们的进出路线，要比土拨鼠群落更迂曲，困在东河隧道的泥浆里时，听天由命地打桥牌。仅长岛铁路公司，去年就搭乘了四千万通勤者，不过许多人，都是踏了自己的足迹，哪儿来哪儿去。纽约有它独特的地形，到头来，城里的居民，有时倒比通勤者走得还远。欧文·柏林沿小街从下东城的樱桃街去上城的公寓，三四英里的路程，却好像绕世界转了三匝。

诗歌压缩在很小的空间，加上韵律，必然意味深长。纽约就像一首诗：它将所有生活、所有民族和种族都压缩在一个小岛上，加上了韵律和内燃机的节奏。曼哈顿岛无疑是地球上最壮观的人类聚居地，数百万常住居民能够感觉这首诗的魔力，但谁又能说得清它的全部含义。高入云端，美轮美奂的写字楼下，是破烂不堪的贫民窟。河滨教堂必恭必敬地举行圣餐礼，隔几个街区，哈莱姆区的伏都教就在施展魔法。商界大亨乘豪华轿车沿东河快行道直驶华尔街，路经几百码外吉卜赛酋长的栖身处，但此大亨与彼酋长从不照面，况且，酋长们还没起身，他们的生活比大亨悠闲，醉酒的时候更多。纽约与巴黎不同，与伦敦也不同。它不是斯波坎市乘六十倍，也不是底特律市乘四倍。它让所有城市望尘莫及。它甚至想法儿在大萧条最低迷的时刻，凌空达到了最高点。帝国大厦拔地而起，高达一千二百五十英尺，而此时，草木长出地面六英寸也是疯狂。（大厦顶部有一座飞艇系留塔，但从没有飞艇造访过；不景气的时候，需要雇人冲洗厕所；它还在大雾中给一架飞机撞过，无数次遭受雷击，时常有人想不开，从楼顶纵身跃下，以致行人经过第五大道和三十四街交界处时，都会下意识地加快脚步。）曼哈顿东西南北，再无可以扩张处，只有向高空发展。这一点，便是它气势恢弘的主要原因了。它对美国的意义，如同乡下教堂的白色塔尖——那是理念与信仰的实在象征，飞升的白翎呼唤，道路就在上面。夏季的游客，乘车晃晃荡荡驶过地狱之门大桥，在皇后区的鸽舍和后院上空滑行，从卧铺车厢的窗子眺望西南，第一抹晨曦投射在中城钢铁铸造的尖顶上，他能清晰无误地看见城

市腾身而起：高墙与塔楼升高，烟雾升高，温度暂时还没有升高，千百万醒来的人们，希望和激情也在升高——如一柄犀利的长矛直逼苍穹。

纽约竟能运转，简直是个奇迹。事情让人完全难以置信。居民每日刷牙，得从卡兹基尔山区和威切斯特县山中汲来几百万加仑清水。曼哈顿的小伙子给他在布鲁克林的女孩儿写信，爱的信息是通过充气管道吹给她的——"噗"的一声，就这样子。电话线、电力线、蒸汽管、煤气管、污水管的地下系统，已经是个足够的理由，让人把曼哈顿岛丢给上帝和象鼻虫了。每次切开人行道，手术的噪声都吵得人毛骨悚然。按理说，纽约早就该毁于恐慌、大火、骚乱，或者循环系统某些攸关重大的供应管线的失灵，或者哪种莫名其妙的短路。城市早就该在某个意想不到的瓶颈处，发生难以收拾的交通混乱。食品供应线若是中断，只须几天，城市就将饿毙。贫民窟流行或船只上的老鼠传播的瘟疫会扫荡它。海浪会从四面八方席卷它。每隔几天，从泽西吹来的烟雾，就像恐怖的裹尸布，大白天遮挡了所有的光线，大楼的办公室仿佛悬在半空，人们摸索，沮丧，只觉得世界末日来临，如此这般，在那些密密麻麻的巢室里工作的人，怎能不精神失常。集体歇斯底里是一股可怕的力量，然而，纽约人似乎每次都能与它擦肩而过：他们坐在半途停顿的地铁车厢里，没有幽闭恐惧感，他们靠几句俏皮话，摆脱惶恐局面，他们咬定牙关，耐心承受混乱和拥堵，凡事总能对付过去。所有设施都不完善——医院、学校和运动场人满为患，高速路乱乱哄哄，年久失修的公路和桥梁动辄寸步难行，空气窒息，光线不足，供暖要么过头，要么差得远。可尽管麻烦不断，效率低下，纽约却以大剂量的维他命补偿了它的居民，这就是对一种独特的、国际化的、强大的、无与伦比的事物的从属感。外来人小住纽约，可能而且往往陷入一连串的尴尬、不便和失望：听不明白饭馆里侍应生的话；分不清哪儿是诓人的酒馆儿，哪儿是规矩的酒吧；进地铁搭错了车；为个小小不言的问题招公共汽车司机顶撞；街上的噪声吵得人一夜无眠。游客奔来纽约，尤其是在夏季——他们一窝蜂地涌向自由女神像，（城里的许多居民从不涉足。）围攻自动售货餐厅，访问广播电台播音室，参拜圣帕特里克大教堂，在商店橱窗前流连。他们大都度过了一段美好时光，但有时在纽约，也会碰上失意者——一对青年男女，显然是游客，可能刚刚结婚，他们的灿烂梦想破灭了。这地方让他们吃不消，他们没精打采地坐在一家小馆子里，闷头吃饭，一声儿不吭。

说起纽约，人们听到的一句话经常是："棒极了，可我讨厌住在那儿。"我感觉，住在乡下和小镇上的人，习惯了方便，习惯了邻里间隔着篱笆和睦相处，想不到纽约生活也有街坊四邻的模式。城市实际上是成千上万个紧凑的居民单位的集合。当然，有大的区和单位：切尔西和默里小丘和格拉默西（居住单位），哈莱姆（种族单位），格林尼治村（热衷艺术和其他事情

的单位），还有无线电城（商业开发单位），彼得·库珀村（住宅单位），医疗中心（保健单位）和许多其他部分，各有各的特点。但纽约的事情就妙在，每个大的地理单位都由无数小区组成。每个小区都自给自足。通常，它长不过三两个街区，宽不过几个街区。每个小区都是城中的城中之城。因此，不管你生活在纽约何处，一两个街区内都能找见杂货店、理发店、报摊、擦鞋摊、卖冰卖炭的地下店铺（路过时，可以把你要买的东西写在门外的便笺上）、干洗店、洗衣店、熟食店（啤酒和三明治随时外卖）、花店、殡仪馆、电影院、收音机修理店、文具店、服装店、裁缝铺、药店、泊车场、茶馆、酒吧、五金店、修鞋店。在纽约的大多数小区，每隔一两条街，都有一处小小的商业街。人们清早出门工作，走不上两百码远，就能完成五六件事情：买份报纸；把鞋送到店里钉鞋掌；买盒香烟；订一瓶威士忌吩咐下班时送来；留个字条给煤炭铺的隐身人；通知干洗店有条裤子等着穿。八小时后的回家途中，买一束绒柳、一个马自达灯泡，喝上杯酒，擦擦皮鞋 ——都在街角下车处与家门之间。这些地面儿事事完备，人们油然而生归属感，许多纽约人一生都守在其中，还大不过一个村子。多走出两个街区，他就仿佛到了异乡，浑身不自在，非得回来。小店的店主对小区的界限尤其敏感。我的一位女性朋友最近搬家，住进另一处公寓，在三个街区之外。搬家后第二天，她出现在多年来一直光顾的杂货店，店主见到她，激动得几乎落下眼泪。“你这一走，”他说，“我以为再也见不着你了。”对他来说，三个街区，或者大约七百五十英尺，就是离开了。

我写这篇文章时，就住在纽约的某个小区，过客而已，或是漂泊者，从乡下来此盘桓几日。夏季是个好时光，可以重新打量纽约，领受私密这一馈赠，进入孤独的最高境界。夏天，城里只剩些死硬分子和响当当的角色。（旅游者除外。）临时性的、来去不定的住户没了踪影，惟有货真价实的老纽约。这里的气氛不觉轻松下来，人们只管围块腰布躺倒，一边呼哧呼哧喘气，一边缅怀往事。我在回想年轻人与大人物同居一城，是怎样一种感觉。我初来纽约时，心中的偶像是十几位专栏作家、评论家和诗人，大名时常出现在报刊上。我始终颇有点兴奋，像是发低烧，因为同一座岛上，还住了唐·马奎斯、海伍德·布龙、克里斯托弗·莫利、富兰克林·P·亚当斯、罗伯特·C·本奇利、弗兰克·沙利文、多萝西·帕克、亚历山大·伍尔科特、林·拉德纳，还有斯蒂芬·文森特·本涅特。我在商会街与百老汇夹角处徘徊，心想：“那座大楼的什么地方，蟑螂阿奇夜里就在打字机键上蹦跳。”那段时期，纽约没给我好日子，但它毕竟让我活下来。我时常快步走过西十三街第六大道与第七大道之间富兰克林·P·亚当斯的住宅，房子似乎在我脚下颤动，一如火车驶离中央车站时，花园大道也会颤动。这种兴奋（与大人物近在咫尺）是绵延不断的。纽约从来不缺慕名投奔的后生晚辈——青年演员、抱负不凡的年轻诗人、芭蕾

舞女演员、画家、记者、歌手，每人都揣了自己的兴奋剂，每人都有自己的一群偶像。纽约不仅给人持续的兴奋，还是个从不谢幕的大舞台。我四下闲逛，重新审视这座舞台，希望能把它写在纸面上。现在是星期六，黄昏时分。我转入西四十八街。从架子鼓和萨克斯管练功房敞开的窗子里，传来音乐教师倦怠的指导声，器乐的嘈杂打破了夏日的沉静。考特剧院涌出日场观众。突然间，整条街响彻一名街头歌手震耳的歌声。他越走越近，寻找知音，是个欢快的黑人，一副唱大歌剧的派头，头颅扬起，恣肆的歌声回荡在高楼壁立的窄街上。长长的手杖，是他惟一的道具，穿着小心而又随意——休闲裤，皱条纹外套，口袋里露出一本书。献艺时间，拿捏得恰到好处，考特剧院上演《可敬的妓女》，观众刚刚接受了种族关系教育，急着想要改善黑人的境况。硬币（多是两角五分的）哗啦啦洒向街头，几分钟的游吟，一名黑人的境况有大约八美元的改善。如果每次献艺都能如此，他就完全可以在这里过活了。人们说，纽约是个机会多多的城市。甚至几分钟后迟来的骑警，也信马由缰，在路边踅来踅去，寻找散落的镍币，像鸟儿寻找抛洒的谷子。现在是七点钟，我再度光顾了东五十三街一家旧日的无照酒吧，准备坐下来吃顿饭。人很少，夏夜电扇的嗡嗡声，偶尔给摇制鸡尾酒的声音打断。小酒吧里黑黢黢的（店主并不认为贩酒法变了，电费就有理由增加）。多么幽暗，多么诱人，渲染意大利湖畔风光的壁画多么绮丽——可能是店主的哪个侄子画的。店主亲手配酒。电扇吟咏祈求风凉的祷文。从另一个隔间传来广播电台主持人的声音，青菜沙拉散发蒜茸的味道。我身后（又是十八英寸），一位年轻文人正试图说服身边的姑娘搬到他那里，做他的恋人。姑娘戒心重重，但他的话入情入理，也并未自视过高。他认为，他们相互之间，应当提供知识与性。从吧台上方的镜子里，我可以看见他们饮了第二轮酒。随后他和她分头去洗手间，两人回来后，争论也无声息了。电扇又嗡嗡地响起来，我又感觉到热浪和轻松的气氛，勾起对许多有趣的非法小馆的记忆，在那里，我曾伴随爱的主题、通风机的声响和杜松子酒消愁止痛的短暂幻觉，多少次津津有味地享用一顿便餐。

另一个溽热的夏夜，我在中央公园林阴道停下脚步，听古德曼管乐队的音乐会。人们坐在乐台前呈扇形排开的长椅上，听得很入神，赞叹不已。林间晚风吹拂，树叶有了活力，哗啦啦地响，像在诉说什么；灯光从下方照亮绿绿的枝条，化作一种新的表达。头顶有飞机悠悠飞过，航灯一闪一闪的。就在我前排的椅子上，少年人坐在那里，搂着他的姑娘，他们相亲相爱，沉浸在音乐中。短号号手走到台前，表演独奏，始于“用你的明眸为我祝酒……”，号声在辽远、温暖的夜空飘荡，那么纯净，那么迷人。随后，从北河那边，传来别一种喇叭的应答——是玛丽女王号邮轮在宣布她的去意。她的独奏与短号不是一个调子，低了半个音阶。乐台上

的号手决不示弱。号声吵成一片，没人介意爱的承诺中暗示了远行。“我将远走，”玛丽号在抽泣。“我的眼波会随你驻留，”号手叹息。沿柏油马路，散步的人来来往往，他们举止小心，免得扰了这里的音乐气氛。棒冰销得很快。篱障外温暖的草地上，人们在阴翳里缠绵，女孩子走近林阴道，裙子给风吹涨，裸露的肩头映在灯光下。“用你的明眸为我祝酒。”迷人的时光，一切又都是免费的。夏季的周末，城里空空荡荡。一个星期六下午，我去了办公室。听不见电话铃响，没有东西填饱来文筐儿，没有纸张的窸窣声，这是座死寂的建筑，一段可怕的休止。整个城市成了空落落的蜂巢——囚犯逃狱后丢下的监牢。夜间，楼里什么地方偶尔响起铃声，有人要用电梯——听起来像是火警铃声。夏季星期六的办公室，恍如孤绝的深渊。我凭窗俯瞰对面一排一排办公室，回想冬日暮色中景象，一切都在全速运动，蜂巢的每个格子都亮着灯，眼前仿佛一幕哑剧，可以看见木偶般的人物翻弄文件，（但听不到纸张的窸窣声。）看见他们接听电话（但听不到电话铃声），铺天盖地的纸片悄没声地川流不息：纽约这个文电之都，与加尔各答联系，与雷克雅未克联系，总有事情得折腾。

在拉斐特咖啡馆，来的尽是熟客，坐下聊天。这里忙乱而又沉静。我啜着咖啡，透过西窗，望见制造商信托公司和九马路北侧的红砖墙面，光线越来越弱，红色慢慢转成紫色。砖楼在向晚时分，自能改换颜色，就像玫瑰凋谢时，会泛出蓝色。这家咖啡馆是一方安歇之地。侍者从不见老，也不更换。决不追逐时尚。圣母守在旅游招贴上。咖啡浓烈，充满菊苣味，很香。夜晚走在包厘街上，头顶是高架铁道，你能感到的，只有冷冰冰的罪恶。有人向你讨一个硬币，你丢下钱，不想碰那手，手太脏了；你尽力避开他的目光，目光中流露谴责。与其说这是对个人的威胁，毋宁说它是一种整体性的威胁——无可奈何的人类苦难和贫穷，以及病入膏肓的酒精中毒咄咄逼人。夏日晚上，醉汉露宿街头。人行道是免费的床榻，没有虱子。行人走过、或跨过、或绕开这些静物，像走在尸横遍野的战场上。门廊下，银行台阶上，游民靠倒头一觉儿来醒酒。他们浇愁后丢下的空瓶子立在头前，像是伫立的哨兵，臂弯里搂定装了各种家当的纸袋子。旅游车上贫嘴的导游告诉乘客，这是“堕落者一条街”，但包厘街并不认为它已经堕落了，它用自己的办法对付自己的问题——酒坊，小客栈，漠不关心，街的尽头处，是贝尔维医疗中心。向东一两个街区，气象截然不同。陋巷里免不了贫穷和破旧的房屋，伴随这些，却是精细和安详的家庭生活。我沿着莱文顿街东行。但见一派欢快、污秽、熙熙攘攘。小店漫上了人行道，只剩下半边给人走路。灯泡没有罩子，明晃晃地照了西瓜和女内衣。楼上的人家逃离闷热的屋子，在人行道上乘凉。他们坐在橙色板条箱上，抽烟，悠然自得。这是广阔的下东城的露天晚会——毕竟，与你在乡间见到的绿草坪间鲜亮的帆布椅上坐着的一些人相比，他

们这炎炎夏日里的一群要顺眼得多。热腾腾的肉体，挤烂的水果味，苍蝇嘬吮阴沟的垃圾，炒菜做饭，这里的一切都透着家常。在刘易斯街的街角，铁丝栅栏后的操场上，正举行露天舞会——街道的某种活动，许是为了遏制少年犯罪。女人推了婴儿车在跳舞的人群中穿行，像是展示舞蹈的最终结果。头顶，滑轮线上挂满了短裤和乳罩，有如装点舞厅的彩旗。音乐停止了，漂亮的意大利姑娘从手袋里取出发刷，在街灯下梳理黑油油的头发，直到头发闪光。巡逻车上的警察怏怏地观望。爱迪生联合公司说，纽约的五个行政区有八百万人口，它当然有能力掌握这一点。如同每个人口稠密的社区一样，这里汇聚了各个种族、各个宗教、各个国家的人。人口数字不断变化——几乎刚刚分类罗列好，情况就变了。可以保险地说，纽约的八百万人中，有大约二百万犹太人——将近四分之一。这二百万犹太人，当然，来自许多国家：俄国人、德国人、波兰人、罗马尼亚人、奥地利人，长长的一串。大纽约城市联盟估计，纽约的黑人约为七十万。其中，有五十万左右住在哈莱姆，从一百一十街向北延伸的一个区。过去几年来，黑人人口迅速增长。今日纽约的黑人比一九四〇年多了一半。有大约二十三万波多黎各人生活在纽约。五十万爱尔兰人，五十万德国人。还有九十万俄国人，十五万英国人，四十万波兰人，大量芬兰人、捷克人、瑞典人、丹麦人、挪威人、拉脱维亚人、比利时人、威尔士人、希腊人，乃至荷兰人，他们很早就来到这里。很难说这里到底有多少中国人。官方宣布是一万二千人，但还有众多中国人非法居留纽约，他们不喜欢人口调查员。这数百万异乡人代表了不同种族、信仰和民族，纽约因他们之间的碰撞与融和，成为世界大同的常年展台。纽约公民的宽容，不仅是天性，而且是必须。这座城市必须保持宽容，否则就会在仇恨、怨愤和偏执的辐射云中爆炸。人们稍微偏离平和与豁达的心路，城市的火气就会蹿得比风筝还高。纽约郁积了各类种族问题，但引人瞩目的不是这些问题，而是大家相安无事。哈莱姆本身就是一座城，象征了种族隔离，但纽约的黑人生活，很少有黑人差别待遇的明显迹象。黑人可与白人一道搭乘地铁和公共汽车，但他们在饭店和餐馆，还感受不到这般平等。就职业而言，黑人在舞台表演、音乐、艺术和文学上很成功，但在许多就业领域，情况还很糟。黑人差别待遇信条主要体现在住房规章和惯例上。私人房东在法律上可以而且也确实排斥黑人。不过，根据最近的一项市政法规，公共财政出钱或享有税务豁免的公寓建筑，在接纳住户时，不得计较他们的种族、肤色或宗教信仰。对纽约人来说，这座城市是恒定的，又是不断变化的。在许多方面，它看上去与二十五年前不同，给人的感受也不同。高架铁路拆除了，除过第三大道，一点也没留。老住户走上第六大道，路过杰弗逊市场监狱，会怀念那铁路，它的轰鸣声，它的斑驳的阴凉，它的小型高架车站和那一阵阵颤动。百老汇的面貌也变了。以前，它在喧嚣繁华的表面下，有一副依稀可辨的骨架，如今的招牌巨大无比，建筑、商店和饭店大都给霓虹灯、文字招牌和蛋奶冰淇

淋广告遮挡得没了踪影。百老汇就像一客蛋奶冰淇淋，表面光鲜，内里空乏。格林尼治村日趋幽暗：公寓楼挤进来，围住了广场，酒吧镶上镜子，镀铬。但村里毕竟还有徘徊不去的诗意、墨西哥玻璃器皿、敲制铜器、蜡染布、威士忌酒瓶改制的灯盏、涉世不深的处女作——这就是老格林尼治村，有小街，有简陋租房，一室而已，适应了一些人变幻无常的需要，他们都有一颗年轻又欢快的心。中央火车站成了夜总会，挂满超大幅的广告招贴，一心走旅游掮客的路线。其实，我曾一度住在中央火车站的终点站，（事事方便，我又没有其他地方好去。）宽旷的大厅对我来说，又是纽约一处予人灵感的室内景象，直到拉斯泰克斯松紧带公司和可口可乐跻身进来。环顾全城，深宅大院正走向衰败。施瓦布在河滨大道上凭眺哈德孙河的宅子消失了。古尔德在第五大道上的宅子成了古董店。摩根家族位于麦迪逊大街的宅子改为教会的办公室。范尼斯托克大宅现在出让给兰登书屋。今日的富人不住大宅子，改住公寓大厦的顶楼，在楼顶平台种树，高出街面几百英尺。报纸也比过去少了，这要拜已故的弗兰克.孟斯之赐。人们怀念《环球时报》、《邮报》、《先驱报》，对许多纽约人来说，自从《世界报》败下阵去，生活再不是原来的样子。

警察现在开警车巡逻，车上装备无线电，不再晃悠着警棍绕街区打转。地铁车票需十美分，座位往往是深绿色，而不是浅黄色。人们上酒吧是为盯了电视看，难得有谁再去沉思默想。这都让人感慨。甚至游行庆典也有些变化。上回在曼哈顿的凯旋游行，满城回荡重型坦克不祥的骇人轰鸣声。贫民窟逐渐让位于恢宏的住房建设——规模巨大，目的崇高，房租低廉。城里散布了几十处这类新的开发地段，每处都是一座城（其中一处在布朗克斯，可容纳一万二千户人家），闲置的天空面积得到开发，引导人们腾空而起，远离了地面，他们的卫生条件规范化了，从此也有个地方坐下，不必坐在橙色板条箱上。联邦的钱、州政府的钱、市政府的钱、私人的钱，都流入这些项目。银行和保险公司也在背后参与其中。建筑师让大楼在地基上略微偏转一点，好改善采光。一些公寓的房租，低得只有八美元一间。还需要而且最终也会建起成千上万的新单位，但纽约永远跟不上自己的脚步，永远无法平衡。经济景气时，人口激增，新住宅从岩石上纷纷钻出。一旦赶上萧条，人口星散，高楼大厦门前冷落，房产主衰败，终至死灭。我来纽约的这些年，纽约的节奏变了，性情也变了。紧张气氛加剧，更多暴戾。你可以在许多地方，从许多人脸上看到这一点。现代生活产生的挫折感，到这里就会翻番，放大——穿越城区的公共汽车跑上一趟，沿途的挫折和麻烦，足以让司机精神错乱：交通灯的转换总是快了半拍，乘客捶打关闭的车门，卡车挡住惟一的通路，硬币失手掉到地上，不该发问的时候偏偏有人啰嗦。气氛更紧张，速度更快。出租车跑得比十年前快了——他们十年前跑得就

不慢。从前出租车司机乐呵呵的，如今他们时不时地很疯狂，像是有今天没明天。在进入城里的西区高速路，驾车人懵懵懂懂地随大流而行——那种无可逃逭的运动很是刺激，后面有人催，两侧给人夹裹，你的车像一片木屑在磨坊的水流中载浮载沉。纽约从未像现在这样糟心、拥挤、紧张。钱多得是，纽约的反应也不慢。餐馆很难挤进去，经理们为了史瓦夫餐馆的一顿午餐，乖乖候在门口，如同失业者排起长龙，只为领一碗热汤。（繁荣期人们排队等一口吃的，萧条期也一样。）曼哈顿的午餐时间提前了半小时，始于十二点或十二点半，指望能先于众人抢得一席之地。人人下班时间都比以往饿了一点。公寓张起“恕无空房”的告示。第五大道的公共汽车上，只有站立的份儿，而从前每个买票的乘客都有座位。旧日的双层汽车消失了——人们搭车再不是为了兜风。某些日子的某些时刻，几乎叫不上一辆出租车，争抢得厉害。你抓住车门把手，拉开车门，发现还有一位从另一侧长驱直入。看门人靠吹哨子调度出租车发了财，一些看门人其实无门可看——不过是在大街上溜达，见机行事，给出租车乘客拉拉车门。与以往稍许悠闲的日子相比，纽约变得不舒适，也不方便了，但纽约人原本就不在意舒适和方便——果真在意，他们会搬到其他地方。纽约最微妙的变化，人人嘴上不讲，但人人心里明白。这座城市，在它漫长的历史上，第一次有了毁灭的可能。只需一小队形同人字雁群的飞机，立即就能终结曼哈顿岛的狂想，让它的塔楼燃起大火，摧毁桥梁，将地下通道变成毒气室，将几百万人化为灰烬。死灭的暗示是当下纽约生活的一部分：头顶喷气式飞机呼啸而过，报刊上的头条新闻时时传递噩耗。城市的所有居民都须面对湮灭无存这一顽固的事实，而这一事实在纽约表现得更为集中，因为纽约本身就是集中的，还因为，所有目标中，纽约在某种程度上显然最受瞩目。在可能发动袭击的狂人的头脑中，纽约无疑有着持久的、不可抵挡的诱惑力。自由女神像一向是纽约的标志，并将纽约推向世界。今天，自由与死亡各行其道。沿东河，在推平的龟湾屠宰场上，好像是为了与鬼魅般逼近的飞机竞赛，人们破土动工，创建联合国的永久总部——所有建筑项目中最伟大者。纽约从容接纳了又一座城中之城，这次是供各国政府栖身，清理叫作战争的废墟。纽约不是政府所在地，它不是国家首都，也不是州的首府。但它正在成为世界的首都。建筑师设想的这座大厦，是个直立的火柴盒状。车辆在第一大道下面的新辟隧道中奔流。四十七街将拓宽，（如果我猜得不错，卡车将在夜晚悄悄开进来，栽种高大的树木，树木的根须与城市的管线纠结在一起。）城市将再一次几乎不动声色地吸纳又一批来访者。它已经表明自己有能力收藏联合国——过去两年来，大批代表活跃在纽约，居民们却很难瞥见他们的燕尾服或黑色礼帽。这场竞赛，这场制造毁灭的飞机与艰难降生的人类议会之间的竞赛，在我们所有人心中留下印记。纽约再清楚不过地显示了普遍的困境与全面的解决方法，掩在钢与石之后的这座迷宫，既是一个绝好的目标，也是非暴力和世界大同的完美象

征，这一目标高耸入云，飞机只能拦腰撞向它，它是所有民族，所有国家的家园，一切事情的发源地，在这里进行的审议，将拦截飞机，抢先阻止它们的毁灭行动。龟湾的这座新的人类之城，向西一两个街区，有一株大柳树，枝条密匝匝遮盖了庭院。这是一株伤痕累累的老树，经磨历劫，攀爬过度，靠铁丝捆扎才不致摧折，但知道的人都对它很有感情。在一定意义上，它象征了这座城市：在艰难中存活，在困境中生长，在混凝土中蓄养元气，兀然挺立，迎向日光。如今我每次见到它，感觉飞机冷森森的阴影，都会想："必须拯救它，拯救这一棵树。"如果它不复存在，一切都将陨灭——这座城市，这个怪异而又神奇的典范，如果抬头望去，消失不见，人将心如死灰。

（E.B.怀特，作家，代表作有《夏洛的网》，《人各有异》。原文链接：https://cochina.org/?p=6528 ）

【返回目录】



【洞见专栏】

陶郁：理性还是情感：什么决定着流动人口的去留选择？

请设想你来自农村，如今正在广州工作和生活。当偶尔被人问起未来数月的打算时，在对去留问题做出选择之前，你是会首先对比离开的成本与留下的收益，还是会首先问问自己是否喜欢这个城市？

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却不仅和中国当前的城市化进程直接相关，也涉及一个社会科学的基本问题，那就是：人的行为到底是更多地基于理性选择，还是更多地遵循心理情感？

为了更加严谨地探讨这个问题，香港浸会大学地理系的两位学者对广州城中村居民的去留意向进行了抽样调查和统计分析，并且将研究成果发表在新近出版的《中国评论》（*The China Review*）上。其基本结论是：流动人口选择留下还是离开，往往并不取决于他们在广州生活与工作得是否满意，而更多地取决于他们对社区与城市是否具有归属感。

自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作为珠江三角洲的中心城市，广州逐渐成为了转口贸易和相关产业的前沿重镇，前来务工的流动人口不断增长，外来人口规模与本地人口规模已经基本呈现出旗鼓相当的态势。这些人口主要集中在工业发达的白云、天河、番禺和海珠等四个新区。目前，白云、天河与番禺三区的流动人口均已超过一百万，海珠区的流动人口也已经超过八十万。

考虑到番禺区的外来务工人员主要居住在企业提供的宿舍中，两位学者对于城中村居民的抽样集中于白云、天河与海珠三区。他们共选择了 12 个城中村，并且在每个城中村里随机抽取 25 位流动人员进行了调查。在调查中，他们将户口作为识别流动人口的主要指标，因为相对于拥有广州户口的永久居民，流动人员只能享有相当有限的社会福利，而他们也往往被认为是“外来者”。为了确保研究的稳定性，所有访谈对象在广州生活的时间都超过了三个月。

通过对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两位学者发现，在控制住年龄、性别、教育程度、城乡户口类别、家庭状况、户口所在地位置与在广州生活的时间等背景条件后，真正对流动人口定居意向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因素就会浮出水面。



具体来说，在背景条件相同或者相似的情况下，流动人口的定居意向，与其对目前对工作、住房条件和居住社区的满意程度无关，也与其对选择定居后能否获得更高收入与能否改善住房条件的期望无关。对于流动人口去留意向真正具有决定作用的，是两个比较抽象的情感因素，即："是否喜欢广州"和"觉得自己与所居住的社区有多亲近"。

这个结果很明显地告诉我们：当流动人口需要决定自己是否选择长期留在广州寻求发展时，他们所采用的策略，并非基于自己当下的工作生活状况和对未来的期望进行计算，而是直接诉诸对所在城市的喜爱程度与对所在社区的亲密程度等主观感受。换句话说，流动人口在广州的定居意向，并不主要取决于他们依据客观条件所做出的理性判断，而更多地关联于他们在生活与工作中对所在城市和所居住社区积累出的心里情感。

不过，两位学者也指出，流动人口对于城市和社区的主观感受并非凭空产生，而是被他们周边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环境所塑造的。更进一步说，即使流动人口能在广州获得比别处更加优厚的待遇，但当他们中的一些人把目光转向自己身边的本地居民时，仍会产生强烈的心理落差。这种心理落差既来自于他们在工作条件、工作机会、工资待遇、住房条件、教育机会、医疗保障和社会福利等方面的劣势地位，也来自本地居民在个人层面上对于外来人员所表现出来的歧视。

此外，相对于来自其他省份的流动人员，来自广东省内其他城市的务工人员更倾向于选择长期留在广州进行发展。两位学者认为，这是因为来自于省内的流动人口与广州本地居民往往具有相同的语言和文化背景，因而更容易融入他们所居住的社区，一般也不会在自己与本地人之间产生出"我们"与"他们"的归属区隔。

如今，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已经进入了非常关键的阶段，鼓励进城务工人员在城市里定居下来，并且确保他们以舒畅的心情从事稳定的工作，对于提高城市化的质量具有重要意义。而发生在部分沿海省份的"民工荒"问题，更通过活生生的现实压力提醒企业与地方政府注意：杜绝对外来人口的歧视，培养外来人口对城市的感情，不仅能让外来人口感觉到温暖，更是保证城市劳动力持续稳定供给的必要手段。

参考资料：



Du, Huimin and Si-ming Li. 2012. “Is It Really Just a Rational Choice? The Contribution of Emotional Attachment to Temporary Migrants’Intention to Stay in the City of Guangzhou.” The China Review 12 (1):73-94.

【返回目录】

【FMN 新闻】

天津蓟县大火

6 月 30 日**天津蓟县**莱德商厦火灾由于一直未有官方消息发布，网络上出现一些消息并引发民众关注，天津此前回应称会进一步回应传言。有媒体报道称，事故原因是空调起火。同时有多家媒体发声要求官方宜尽快公布信息。

新闻：http://fmn.cc/LKnEwC

6 月 30 日**天津蓟县**的莱德商厦发生大火，官方第一时间公布遇难者人数为 10 人，这一数字却引发了人们的质疑，火灾发生第七天，天津蓟县公布了 10 名死者的名单，并称遗体已被家属认领。

新闻：http://fmn.cc/LKnqpq

新华社则报道称， 2 名留院观察的**蓟县**莱德商厦五楼营业员回忆说，"火灾发生时，五楼营业员加上顾客总共不到 20 人。"消防队则回应称接警到赶到现场只用了 8 分钟，据悉当时 16 名伤者中仍留院观察的 7 人具备了出院条件，起火原因仍在调查中。

新闻：http://fmn.cc/LKofyD

7 月 6 日是火灾死难者的"头七"**天津蓟县**公布死者名单并称无人失踪，当日下午 3 点，天津蓟县鼓楼聚集了大量民众参加悼念活动，不过现场并无任何仪式，人们只是聚集，据参加活动的网友表示，通往蓟县鼓楼的道路被封锁，警方指挥交通要求车辆绕行。下午 3 点半左右，现场开始喊话要求人们撤离。

新闻：http://fmn.cc/M8xGT3

此前有网友呼吁 7 月 6 日在**蓟县**鼓楼广场集会悼念火灾中的死难者，当天确有很多民众到了现场，虽然没有举行任何仪式，但当局仍然十分紧张，组织警力将广场上的人群清出，并关

闭了道路两旁的店铺，过程中未发生对抗和冲突，现场比较平静。

新闻：http://fmn.cc/M9S6eg

有媒体记者采访到了**蓟县**大火中一名遇难者家属中，据悉黄景生、刘凤丽一家三口当日下午到商场购物，火灾发生时他们发现 1 楼的逃生通道被关闭，几经波折他们砸开了 2 楼的玻璃逃生，等待逃生的顾客约有十余人，最终通过接力方式救出 4 人，而包括刘凤丽在内的其他人则没有逃出。

新闻：http://fmn.cc/M8y9o7

随后**天津**称大厦起火原因是商厦一层空调电源线发生短路，同时公安部门表示，"近日，有个别网民在互联网上编造、传播谣言，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根据已查清的相关事实，公安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对造谣传谣者进行了处理。当事人已承认夸大死亡人数、冒充武警和目击者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等事实，表示悔过。"

新闻：http://fmn.cc/Mkokm5

无独有偶，7 月 9 日下午 1 点左右，**天津市北辰**科技园区管委会后面的泰伦特化工厂起火，目击网友称还发生了爆炸，爆炸持续约 20 分钟，起火厂房还偶尔窜出火球。网友还称目前已有 20 多辆消防车进入，工厂员工和管委会成员已被疏散。事故中无人伤亡。

新闻：http://fmn.cc/L39D76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

镇坪强制引产案仍在继续，自从 6 月底，曾家镇在邓吉元家门口组织人打出"卖国贼"的条幅后，就没有人见过邓吉元，7 月 5 日，镇坪强制引产事件当事人的丈夫邓吉元对媒体讲述了他如何逃离镇坪到北京。他发现镇坪的各个出口都被重重设卡，只得在山上躲了一夜才得以逃出镇坪，并到北京寻求律师的帮助。

新闻：http://fmn.cc/M1ka8X

7 月 9 日下午，邓吉元的代理律师张凯通过微博对外表示，**陕西镇坪**堕胎案，尘埃落地。他说，当事人的丈夫邓吉元给他电话，已经回到镇坪老家，并已与相关政府人员达成协议。"他

们一家对外界的帮助表示了感谢。同一日，美国众议院召开听证会，关注中国陕西怀孕 7 个月的孕妇冯建梅遭强制引产、堕胎事件。

新闻：http://fmn.cc/PJSCXf

http://fmn.cc/PJWSpL

随后媒体披露了协议内容，**曾家镇**政府与冯建梅、邓吉元夫妇于 10 日下午签署一次性补助协议。根据协议内容，冯建梅、邓吉元夫妇将获得护理费、误工费、营养费等共计 70600 元。当地政府还将帮助冯建梅的家庭解决生活困难，在发展生产、脱贫致富上给予一定扶持，使其尽快恢复正常生活状态，并按相关政策对邓吉元患病的母亲给予大病医疗救助。

新闻：http://fmn.cc/LgVHev

而另一方面。已经有两个小孩的**福建**人潘春烟和吴良杰也经历了同样的遭遇，今年 4 月 3 日因为怀上了第三胎，潘春烟被村里的干部强行带走。并在怀孕 8 个月的时候被实施了强制引产，而且在医院出示的终止妊娠同意书上，患者和家属的签字是由当地一名村干部代签的。潘春烟说，自己被强行按了指纹。

新闻：http://fmn.cc/LgRhUX

这名居住在**福建省仙游县**的父亲同样选择了到北京寻求帮助，并向外界发布了一封信，详细讲述了妻子被引产的情况。期间政府工作人员和村书记先后向他家索要数万元钱财，代理律师表示，将代理这一案件并向有关方面要求赔偿损失。

新闻：http://fmn.cc/Mg4N7q

7 月 5 日，由**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湛中乐、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建新等 5 名学者和社会人士发起，另 10 名学者参与签名的建议书被寄往全国人大法工委和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这些人士呼吁“在尊重公民生育权的前提下，让公民自由而负责任地进行生育，按此基本精神，对计划生育法律进行修改。”

新闻：http://fmn.cc/M3xeut

国家**人口计生委**近日也表示，在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的现状下，老年人照料将与计划生育家庭养老相结合，并进一步加大对计划生育家庭的奖励扶助力度，为老龄人提供力所

能及的帮助。

新闻：http://fmn.cc/Mkr4Qy

中国同邻国领土争端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将钓鱼岛中的 3 座小岛收归国有，目前已与土地所有者展开了交涉。由于东京都政府已决定购买这 3 个岛屿，政府有关人士 6 日前往都政府，向知事石原慎太郎传达了国有化计划并寻求理解。

新闻：http://fmn.cc/MjCoCS

中国外交部则在 7 日和 9 日表态称，相关官员已于 7 日分别在北京和东京针对日方有关动向提出严正交涉，表明中国政府捍卫钓鱼岛领土主权的坚定立场，称决不允许日方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采取任何单方面行动。

新闻：http://fmn.cc/PEUhxb

美国国务院高官 9 日则对外首次明确表示钓鱼岛适用日美安保条约。前一日中国海军宣布 10 日开始至 15 日在东海进行实弹演习，还在当地媒体上发布了禁航通告，这一演习的微妙时机引发了各界关注。

新闻：http://fmn.cc/PJYTSJ

http://fmn.cc/MjD76P

而对于钓鱼岛的争端，**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 7 日也表示，基于民族大义，必须坚持，一寸都不能让步。台湾“外交部”发言人 9 日表态称，会持续坚定表达钓鱼台主权属于中华民国的立场，对日方所采取有损中华民国主权的片面作为，都不会承认。

新闻：http://fmn.cc/MjCPgm

http://fmn.cc/MjCx9d

今年 6 月 21 日，中国批准成立**三沙市**，中国媒体近日探访市政府所在的永兴岛，岛上办公大楼等都在整修，并酝酿换牌仪式，而岛上还将新建拘留所，用于关押外国侵渔人员。

新闻：http://fmn.cc/MjCvy4

中国天主教

中国天主教会于 7 月 6 日、7 日分别举行黑龙江教区岳福生主教、上海教区马达钦助理主教的祝圣活动。而梵蒂冈方面则表示抗议，称任命没有获得教皇的批准，是非法的。中国宗教局则称，梵蒂冈方面以所谓其中有关人选未经其批准为由，发表声明进行公开指责和威胁，态度极其蛮横无理，令人震惊。

新闻：http://fmn.cc/MkrxlM

http://fmn.cc/MkrxSR

天主教**上海**教区 7 月 7 日为马达钦主教举行祝圣礼，马达钦在发表谢辞时在千名教友和官员面前宣布，他是教宗任命的辅理主教，只会接受梵蒂冈方面的任命，他还宣布由即日起放弃爱国会职务。而马达钦在仪式后一度同外界失去联络。

新闻：http://fmn.cc/McVwMg

上海天主教主教马达钦在北京官方认可的祝圣仪式上宣布不方便再担任爱国会成员后，目前身在上海市郊的佘山修院。据称他仍有行动自由，但被当局限制行使主教牧职。北京外交部星期二称对此不了解情况。而梵蒂冈声明称马达钦“令人赞赏和鼓舞”，并表示将把上周末未经教宗本笃十六世批准而被中国任命的黑龙江教区主教岳福生逐出教会。

新闻：http://fmn.cc/LgVgRe

其他重点新闻

7 月 5 日上午，有数百名非京籍学生的家长到**教育部**门外请愿，不过却遭到了暴力对待，多名家长被打伤，其中两名家长被带至派出所笔录，直到当日凌晨才走出派出所。另外教育部副部长杜玉波日前透露，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要参加升学考试的意见国务院已同意，将适时发布。

新闻：http://fmn.cc/NdL3E6

http://fmn.cc/MjEHWm

四川什邡上周的抗议事件成为中国网民的焦点，7 月 5 日晚德阳副市长兼任什邡市委第一书记，官方通报称仍有 3 人被刑拘，有 15 名市民受伤住院治疗。不过《经济观察报》记者实地采访称，仅二医院就至少收治 40 伤者。

新闻：http://fmn.cc/OaTSeE

http://fmn.cc/ODOpl3

http://fmn.cc/L4DfFO

近日，中国国家**广电总局**和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网络剧、微电影等网络视听节目管理的通知》，称将加强对网络剧、微电影等网络视听节目的管理，要求一律先审后播并坚持"正确导向"，并要求行业协会开展自律。

新闻：http://fmn.cc/MjF9E0

江西九江的民警段兴焱 7 月 7 日发消息称，因为被官方请"喝茶"，他将会把微博的认证标志去除。这位警察透露，约谈过程中上级提出了诸如他的微博阴暗、将监控他的微博、他利用了职业的特殊性及职务的敏感性等等说法，由于他因发微博而遭到约谈，这一事件引起了网民们的关注。

新闻：http://fmn.cc/OOtPhV

6 月 26 日至 7 月 31 日，**公安部**将分三期对 2010 年以来新任的 1400 名市县两级公安局长进行集中轮训，培训的主题是，提高一线执法者能力，维护地方稳定发展；课程设置包含如何提高执法能力、应对网络舆情、驾驭基层复杂局面与促进警民关系建设等等。

新闻：http://fmn.cc/MjEX7U

香港向学生发放的国民教育手册被批评内容偏颇并涉及"政治洗脑"，手册中形容中国的执政集团"进步、无私与团结"，并称美国"政党恶斗，人民当灾"，引起广泛争议。有香港的议员表示，担心学生变成红卫兵。

新闻：http://fmn.cc/NG33pd

http://fmn.cc/MjFsi4

广州市 6 月 30 日突然发布了车辆限牌的政策，意见征求稿则在 7 月 10 日才出台，该办法规定，试行期内，广州全市每年 12 万配额车牌将采用一半有偿竞拍，一半无偿摇号模式分配。每月 1 万的车牌中，88%分配给个人，12%归单位。

新闻：http://fmn.cc/OaUwsp

本月开始，中国**卫生部**公布的新的《献血者健康检查要求》正式实施，其中一项 1998 年起的禁止女同性恋者捐献血液的规定被废除，同时关于献血年龄等也做出了修改，但由于认为男同性恋间艾滋病感染较为高发，男男性行为者献血仍被中国禁止。不过媒体对于如何判断“有性行为的男同”提出了疑问。

新闻：http://fmn.cc/MjECSv

媒体报道指，一名 22 岁的藏族人 7 月 7 号在**拉萨**附近的当雄县城自焚进行抗议，自焚者名字不详，但有消息指他是拉萨当雄县当曲卡镇曲登乡人。青年全身烧伤面积达 90%，但由于消息被封锁，他被送医后，目前生死不明。

新闻：http://fmn.cc/MjEClB

7 月 11 日有在**贵州安顺**地区旅游的重庆网友发微博称，他们旅行途中见到一架飞机坠毁在安顺，随后赶来的消防员和警察将现场封锁，有一些现场人员拍照的手机被收。该网友称无人伤亡。官方未对此事进行通报。

新闻：http://fmn.cc/S93QlB

山东媒体前几日报道了在**德州夏津县**一名 13 岁男孩杜传旺，因同事的玩笑，用于汽修的高压泵塞进肛门，导致他的大小肠二十多处破裂，多个器官受损，生命危在旦夕，这则消息被发布在微博上后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12 日小传旺将被接到北京进行治疗，慈善机构也接受到了 14 万元的善款。

新闻：http://fmn.cc/S98iR8

视频：http://fmn.cc/N0ZgXw

【返回目录】



此电子周刊由“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志愿者团队制作，“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开始于 2009 年 8 月，每月在香港举办一场公开讨论，并借助网络视频直播、文字直播等方式将现场放大至全球任何地方。我们希望提供独立、客观、理性的观点和论述，并关注被主流媒体忽略的议题和讨论。目前已举办二十三场讨论，嘉宾有艾未未、长平、陈冠中、贺卫方、胡泳、梁文道、欧宁、潘毅、叶荫聪、周保松、许宝强等。2011 年 6 月开始，为了丰富论坛的主题，我们在固有论坛的基础上开始一个 Co-China X 系列，这些讨论、沙龙由 Co-China 同一些友好团体合作举办，试图将更多有价值的讨论呈现于网络。论坛网址：https://cochina.org/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 doc 版本请发一封空邮件至 cochinaweeklydoc+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 pdf 版本请发一封空邮件至 cochinaweeklypdf+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 mobi 版本请发一封空邮件 cochinaweeklymob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 epub 版本请发一封空邮件 cochinaweeklyepub+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也欢迎大家转发分享。

若希望想加入“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的志愿者团队，请发简历和个人陈述（说明希望加入志愿者团队的原因）至 forum@cochina.org。

论坛网址：https://cochina.org/

论坛 twitter：Co-China 论坛（http://twitter.com/#!/CoChinaOnline）

论坛新浪微博：1510 周刊（http://weibo.com/1510weekly）

编辑：宗洁、姚梧雨童、曾维琪

校订：张博

主编：方可成

版面设计：豆弟

配图：潘雯怡



技术支持：毛向辉、舒欣

出品人：杜婷

